

佇立高牆 星滿天②

誌香港基督徒學會

二十五週年會慶



周兆祥 · 文思慧 · 劉子睿 · 羅永生
胡露茜 · 張婉雯 · 黃麗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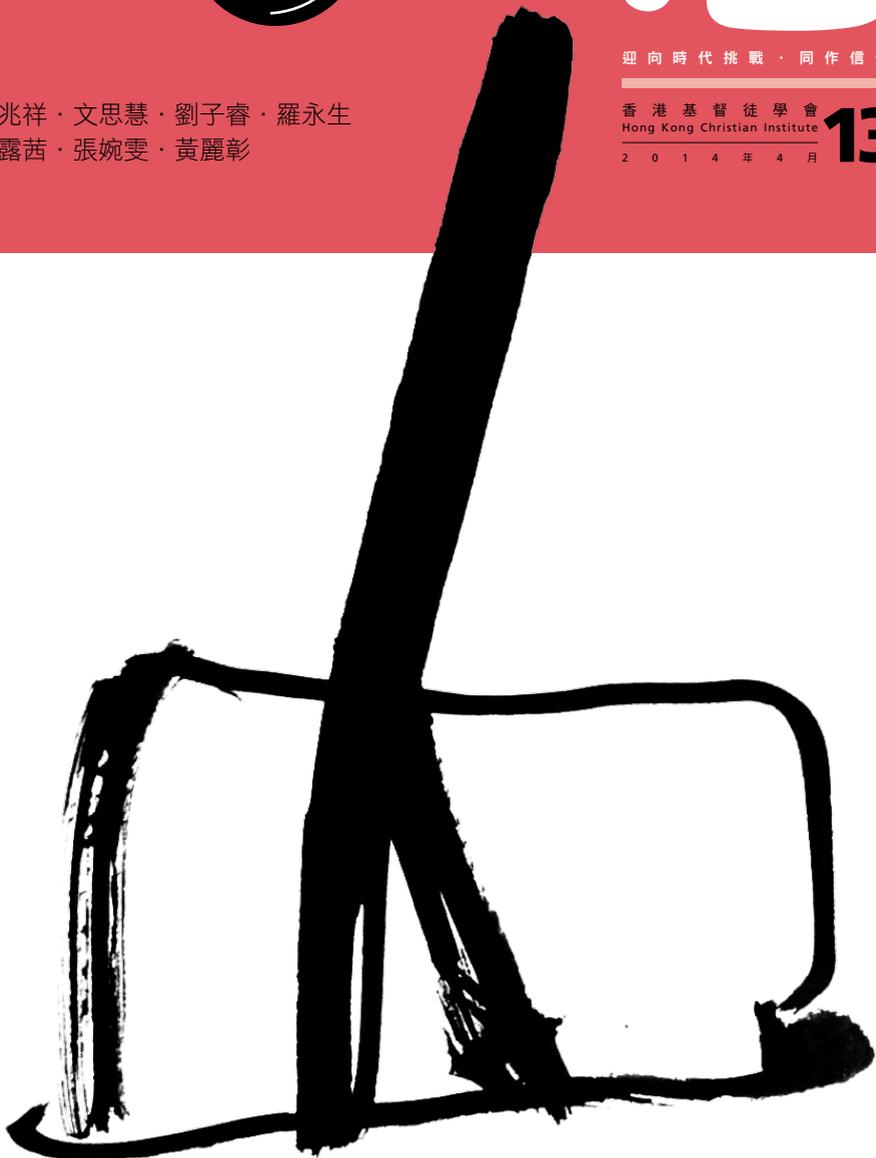
恩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 0 1 4 年 4 月

132



佇立高牆星滿天（二）誌香港基督徒學會二十五週年會慶

思 | 132期 | 2014.4 | 目錄

綠色浪潮：環保與你 | 周兆祥 · 4

- 綠色運動：文明新趨向 · 6
- 綠色運動是甚麼？綠色甚麼運動？ · 26

可持續發展 | 文思慧 · 28

- 可持續甚麼？誰敢在生活中思考環境議題？ · 30
- 跨國企業撒下的綠色羅網 · 34

中國宗教政策對香港未來的衝擊 | 劉子睿 · 40

- 中國宗教政策陰影下香港教會出路的反思 · 42
- 對抗「統戰」的「新戰線」 · 48

宗教右派 | 羅永生 · 50

- 作為保守主義社會運動的宗教右派 · 52
- 全面出場的宗教右派 · 56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思想 and 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五期本地港幣二十五元／海外港幣四十五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劉子睿、梁恩榮、文希甄、鄧寶山、龔立人、鄧長祐、區可茵、司徒樂天、湯泳詩

■ 督印人：范立軒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hkci@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攝影：莫永雄 ■ 承印：Eprint

REFLECTION No.132 April 2014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佇立高牆星滿天（二）誌香港基督徒學會二十五週年會慶

思 | 132期 | 2014.4 | 目錄



誌香港基督徒學會二十五週年會慶

性傾向歧視立法 | 胡露茜 · 58

- 同志身上的基督 · 60
- 超越恐同及性／別二元的基督信仰 ·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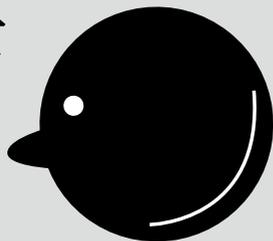
還動物一個公道 | 張婉雯 · 68

- 關懷動物從來是人類自救 · 70
- 讓「失敗者」領我們到迦南—談動物權益與「佔領中環」 · 74

香港社會的心靈面貌 | 黃麗彰 · 76

- 我們的社會患了甚麼病 · 78
- 給我們的城市一份盼望 · 82

編者言



思

編者言

佇立高牆星滿天（二）沒有如期在2月出版，抱歉。實在太不專心了，從事編輯和寫作的人，不專心可是個大忌。

（二）是（一）的延續，「佇立高牆星滿天」是學會二十五週年紀念呈獻給社會、教會和同行者的一份有心思和有意義的禮物。我們在過去每年的《思》選出一期的其中一篇文章，邀請作者以同一個題目或題材，新寫一篇分析和回應當下的文章。沒有看到（一）的朋友，歡迎到學會索閱。

萬萬想不到，文思慧老師竟在2013年12月17日離世，編者的電郵中仍存留著因為邀約她為這本紀念特刊撰文而有的通信。她9月18日交了文稿，翌日編者以電郵回覆致謝，並寫了一首打油詩以誌中秋和對綠色生態的願景：「舉頭望明月，明月澄明澈，明澈千個秋，千秋照團圓！」想不到此成永訣。

文思慧老師一生為環境生態奮戰，推動廢核、本土經濟、有機耕種，不遺餘力；她的離去，對她的伙伴和戰友無疑是重大的打擊，對社會甚至國際而言，也是損失了優秀的社會資源。不過，文老師也實在是太累了，也許上主也不忍心，於是要把她接走，讓她可以休息。

忘了以下這個迷思的來源，說生命離開了塵世，會留在天空成為星星，繼續守護地上的生命，與地上的生命一起打拚。編者選擇相信這是真的，若「佇立高牆星滿天」是言說「君子毋懼佇立危牆之下……因為高牆不能擋住滿天耀眼的星星，繁星越過高牆，啟示我們黑暗不能掩蔽光亮，光明總是在黑暗中閃耀。」見【「佇立高牆星滿天」（一）之編者言】那麼，此刻這標題更多了一重意義，就是像文思慧老師這樣的先賢先哲，化作滿天耀眼的星星，守護著我們，使我們縱然佇立危牆之下，仍然有勇氣有力量為自由、為生命而奮戰。

這一期的文章可分為三類：生態環境保育、宗教政策與宗教右派、生命的尊嚴與權利。最後以黃麗彰博士的文章作結，那是一個定位於靈性的總結，也許，靈性應該是一切的開端。





綠色浪潮：環保與你

| 周兆祥

1991

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已經不斷有人逐漸覺悟，明白到當前西方文化帶頭的物質主義「發展」取向的社會，不但不能為大家帶來幸福的生活，還促使整個人類文明直衝向永遠的毀滅。這種內心的轉變令億萬人開始樂於減少消費、改變人生追求的目標、改變生活方式、重視與人的交往、重視靈性生活、重視與大自然的溝通，從這一切中得到長久而深度的喜樂，生命恢復意義與方向。

2013

等到二十一世紀降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綠色浪潮洶湧澎湃，本地社會才陸續醒覺，加上其他有關的因素，幾乎一夜之間，我們社會大眾日常生活處處開始綠化，包括接受有機產品、公民社會致力保育環境生態、商界普遍以綠色作招徠、民間開始擁護自然的醫療、法例引進綠色的成分等等，連政府亦加入宣傳綠色生活了（即使仍然流於表面化）。

綠色運動：文明新趨向

思 · 13期 | 1991年5, 6月

周兆祥
綠色力量發動人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八十年代開始，全球抓起了一個前所未見的運動，風起雲湧，逐步在改變政治、社會、經濟、宗教、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藝術、人際關係等等的面貌，成為二十世紀末年最觸目的人間革命。大家叫它做「綠色運動」。

沒有人再敢忽視或輕視這個新趨勢，它對於了解人類文明的未來舉足輕重。

究竟何謂「綠色運動」？參與者是甚麼人？他們主張甚麼？這個運動跟我們每個人又有甚麼關係？

一、「綠色運動」是甚麼？

「綠色」是甚麼意思？綠色是自然界生命最普遍的顏色，近年來關心環境生態的人士拿來作為自己的代表象徵，與「灰色」（代表工業社會制度）及「紅色」（代表激進的左派思想）相對。

大致上說，「綠色」與「Ecology」是同義的。「Ecology」源於希臘文，意為「家居的知識研究」，近年來「家居」被用作指地球與自然環境（人人之家），而「Ecology」一詞既指「有關生物與其環境的純學術性研究」（即「生態學」），又指關心環境的活動（即「生態關注」）。西德的綠黨（die Grunen）與比利時的「生態黨」（Ecolo）、英國的綠黨，以前叫「生態黨」（Ecology Party）大致上是同一種組織，目前全歐洲十多個國家都有這類政黨，世界各地也有以保護環境為主要任務的關注生態組織，例如香港的「綠色力量」、「長春社」和「地球之友」會，後者是Friends of the Earth這個國際組織的分會。

從七十年代開始，歐美各國逐漸形成了所謂「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其中包含各色各樣的團體與人士，大部分是互不干的，有些甚至不知道或不承認自己屬於「綠色」分子。今天，西歐和北美各國，有一成以上的人可以說是「綠色」的（雖然「深」「淺」不同，見下文解釋。）

二、「綠色」人士是甚麼人？

所謂「綠色」分子其實包括許多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人，為了方便介紹，以下把他們分為四大類來描述。

關注環境人士這類人可以分為三派：

1. 保守派——他們大多數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看到周圍的環境大受破壞（例如空氣污染、名勝山水給搗毀），不忍之情由之而生，同時他們也感受到現代工業社會怎樣摧殘人生，其帶來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如何破壞人際關係和社會道德，於是他們從不滿到恐懼，知道長此下去人類社會將不收可拾。但是這類人只是想加強公民教育，透過法律來重整秩序，維護安定，恢復昔日（據說是）美好的生活方式與環境。他們並非真的想改變社會，還努力維護許多傳統價值觀，所以不算是「綠色」分子——他們絕大多數也不肯這樣承認。
2. 激進派——他們大多數是社會上低下層或嚮往左派政治理想的人，深深體驗到工業社會如何過著非人生活，官僚制度與中央集權強迫人過的制度（包括政府、工商業、教育、醫療等）如何剝奪人的自主與自由，也明白到科技主義思想如何無法解決當前世界的問題，於是大膽提出全新的人類社會藍圖：小規模的、自給自足的、不受中央政府權力過分壓迫的社區。這類人大多數身體力行、或多或少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加入實驗性或革命性團體生活（例如各種公社），小部分甚至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他們致力基本改革社會，更新價值觀，是不折不扣的「綠色」分子。
3. 改良派——首兩派的人只佔關注環境人士的少數，因為其餘的大多數都是改良主義者；他們從不同深度看到問題所在，知道其嚴重性，但不主張大刀一斧改革，即使肯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只是很少部分。改良派的主要成分是中產階級，他們接受工業社會的秩序，自己樂於做既成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聽到「徹底改革」就會大感不安。他們會從生活小處企圖改變社會，例如提倡清潔河流、循環造紙、多用自

行車少用汽車等，但不會致力改變社會的結構或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這類人較左傾的都可算是「綠色」分子，較右傾的不會喜歡被看作「綠色」分子，雖然他們往往越來越接近「綠色」哲學，變成「綠色」。

B. 生活實踐人士

除了上述幾類「關心環境問題的人士」之外，還有不少人的生活方式或工作是與「綠色」運動息息相關或目標頗一致的，其中比較重要的如：

1. 放棄大都市生活，到鄉間定居務農為業的人士；
2. 提倡「有機農業生產」（即拒絕用化學來殺蟲、施肥、餵飼牲口）的人士；
3. 熱心提倡自行車的人士；
4. 熱心提倡素食人士；
5. 熱心提倡循環使用物料的人士；
6. 熱心提倡「另類醫療」（即不單依據西方科學式醫術來維持健康）的人士；
7. 提倡「合適科技」（即日常活不盲目追求先進高科技）的人士；
8. 提供「小的是美好的」（即主張小社區、權力下放、自主自給自足的社會秩序）的人士；
9. 提倡「另類經濟結構」（即主張擺脫大企業壟斷、鼓勵小規模生意）的人士；
10. 提倡簡樸生活、重靈性生活的的人士。

以上只是為了方便介紹而分類，其實大多數「綠色」分子都支持這些主張，也會在不同程度上身體力行，而上述的人士特別重視其中幾種原則，以此作為生命的一個目標。

C. 壓力團體

不少壓力團體主要工作目標雖然不是提倡「綠色」哲學，行動卻越來越接近其原則

與方向，包括：

1. 監察農藥及食物安全的組織；
2. 反對軍火貿易及跨國企業活動的組織；
3. 女權運動組織；
4. 反核武器組織（和平運動）；
5. 反核電組織；
6. 維護動物權利的組織；
7. 監察地區性環境污染情況的組織；

這些組織的成員加起來人數眾多，雖然他們個別未必當自己是「綠色」分子，但工作的方向符合「綠色」哲學，可算是整個「綠色」運動的一部分。

D. 政治活動人士

這些人篤信「綠色」哲學，深信只有推廣它才可以拯救世界，並且認為空談不會有甚麼結果，推廣「綠色」運動非靠政治活動不可。他們知道參政有兩個好處，一是抓政權（或在政府裡產生制衡的作用），直接左右國家或地方的政策；二是在競選活動及議會的辯論中，得到絕佳的機會向國民解釋「綠色」哲學理想和實踐方式。這些人按照其所屬黨派可分為兩類：

1. 在左中右黨派內有「綠色」思想傾向的人士，包括越來越「醒覺」的政治家和黨支持者，及加入各黨活動的「綠色」分子；
2. 「綠色」政黨的成員，他們相信只有自己組政黨才有機會落實推廣這個運動，雖然目前這些政黨只能在權力運作場所的邊緣活動，對政策影響不大，但他們仍努力不懈。

由以上的介紹可見，「綠色」運動其實包括了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們在不同的崗

位分頭按自己的信念工作，很大部分甚至不覺得自己是在參加推廣「綠色」運動（也許本文的讀者不少看完後才發覺原來自己是那麼「綠色」！）。

三、「綠色」哲學是甚麼？

那麼，說到底，究竟「綠色」哲學是甚麼？以上的所謂「綠色」人士有甚麼共通之處？基本的立場，就是明白到當前這個人類社會正在一條通往集體毀滅的道路上飛馳，若不及時改變方向，大災難遲早必然發生。為甚麼會這樣？因為：

1. 從生態方面說，工業化的消費主義社會不斷消耗資源、破壞環境，地球不勝負荷，生態災難已經一一出現；
2. 從社會方面來說，工業化城市化社會令人疏離、非人化，人際關係破壞，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令人沉溺物欲，在惡性競爭裡掙扎；
3. 從經濟方面說，目前全球左中右的政府一律不斷追求經濟增長，而地球資源始終有限，無可避免造成通貨膨脹、集體失業、經濟危機、社會動亂；
4. 從政治方面來說，目前的國際秩序不但無法縮減富裕世界與貧窮世界的距離，還必然繼續加深兩者的矛盾，衝突只會惡化；而且目前這種形式的政府，受軍事工業集團控制，搞軍備競賽，也隨時會令計時炸彈提早爆炸，集體毀滅；
5. 從健康方面說，空氣、食水、食物、噪音等污染無處不在，令人早死、長期生病。人類的遺傳基因正在逐漸受到化學及輻射物質破壞；
6. 從靈性方向說，目前的社會結構與流行價值觀令人無法得到心靈的滿足，造成越來越多人生命沒有目標、失去意義。

「綠色哲學」不是一個宗教派系，沒有既定的、公認的教條，這個運動的參與者大致認同以上的世界觀，但對於「怎麼辦？」卻有不同的意見。大致上說，他們奉行以下幾點原則：

／再把人放在第一位，強調自立自主，不做制度、機器、欲望的奴隸。

時至今日，人的地位已經降至歷史上的空前低點，大家長期以非人方式過日子，處處「身不由己」，人性的需要得不到滿足。目前大多數人受到奴役主要是因為制度的控制、機械的主宰，還有錯誤的人生觀與生活方式，造成欲望膨脹，無法控制。要解決這個問題，人類只有認準目標、排除萬難，爭回自主。

／人生重訂生命目標，理解真正的需要與幸福。

按照綠色思想的分析，上文提到那一個個嚴重的問題，都是源於人類近來錯誤地解自然本性，處處與大自然對立（「征服」自然），違反本性來生活（忙忙碌碌，整天在室內與機器相處等）。

現在我們都好像本來設計燒電油的汽車，長期入油渣；又好像本來設計來剪布的剪刀，天天給人拿去切肉。我們更好像著了魔的豬隻，一生亂衝亂撞不知為甚麼。所以，要撥亂反正，我們首先要弄清楚自己在大自然（天地間）的角色、使命、存在意義，否則一生不會幸福。

在目前這種社會裡，大多數人失去了主宰自我的能力，終生混混噩噩，不知自己在做甚麼，究竟是為了甚麼而做，我們大都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或目的，因為社會風氣是如此，大家便都隨波逐流。總而言之，香港人都是用開始的二十年去拚命求學，作好將來賺錢的準備功夫，由二十多歲到退休前的日子，拚命地去賺錢，到了退休之後便胡裡胡塗地走到人生的盡頭。整個人生是早被人安排下來的，人不斷地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但又想不到有其他選擇的事。

我們必須要從社會的層面改變這種情況，讓每個人有機會真真正正安排自己唯一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讓人人明白到：其實無需要跟大隊走，由小到老做無聊的事。

／與大自然恢復溝通，不再對立，大家認識自己在天地間的角色與意義。

此外，今天全球生態危機弄至不可收拾，皆因現代人不再敬愛大自然，甚至不再去關心了解，反而處處敵對，要去剝削、破壞，又自私又不負責。所以，要矯正這種



偏差，我們必須恢復與大自然的溝通與聯繫，終止對立的想法。

／尋回靈性世界的刺激、喜樂、滿足、改變生命追尋的方向。

現代社會另一個可怕的偏差，就是大家重物質而輕精神，以為只要解決了物質生活，增加感官刺激與生理上的享受，人自然會快樂幸福。事實恰好相反，我們越物質充裕，內心越空虛，生活越不幸福。這是因為人與走獸不同：我們需要靈性生活，開拓內心的世界，才活得妥當歡欣。

因此，當務之急是改變社會的風氣與結構，讓人不再處處受到物質主義束縛，減少物質的牽絆，可以懂得又有機會追尋靈性的滿足。

換句話說，人類的世界觀、生命方向都要改變，恢復先代的智慧，再找到靈性層面的刺激、喜樂，人生得到真正的滿足。

／社會所有組織切合人性需要的規模，恢復正常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現代社會越來越中央集權，甚麼都越來越大，人生也越來越渺小，人對周圍一切的控制也越來越無能，影響力與價值隨而下降。今天每一種事物差不多都太大了，例如學校、工廠、醫院、機關，以至城市都太大了。一切都太大的時候，人，便不再是人，人再沒有其獨立性，再不能自主，全部的人已變成了一個無意義的號碼，或一些微不足道的零件，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不能避免的隔膜。長此下去，人無法再肯定自己的價值，無法投入生活，所以綠色思想主張一方面重新訂好人與科技的關係，一方面用智慧設計一切制度的規模，不盲目追求大。

／提倡「後父權價值觀」，改變社會風氣，讓女性平等生活，貢獻社會，一起掌舵。

綠色思想十分重視提高女性的地位，肯定她們在人類社會的角色，因此，提倡「後父權價值觀」，現今的社會是一個父權社會，一切均以男性為主，社會上一切的安

排，我們的秩序、架構、人與人之間的運作方式以至平時生產及生活的方式等，全部都是照男人的價值去做的。

但女性亦有其長處，撇開生理的層次不談，男性與女性也是有極大的差異的，女性對世界的看法、處事的方式以及她們的觀點，都是與男性截然不同的。其中最顯著的分別就是：男性是最容易與人發生衝突的，稍有不滿便要動粗；動輒追求侵略與霸佔，要控制及操縱；男人也從不肯認輸，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為了面子，也要硬爭下去；男人又十分喜歡用競賽的方式向別人表現自己的能力。總括地說來，男人是喜歡逞威風的、主宰他人的。

相反地，女性是較為重視和諧及重視合作的；試以一些全女性的機構與普通男女混雜的機構比較一下，你會發現全女性的機構是較為平等得多和重視合作性的。並且女性比較肯認輸、不計較吃虧。女性還有幾種能力是男性望塵莫及的：第一種是直覺十分敏銳，男性想不到或觀察不到的事，她們卻能得到及觀察得到。女性又十分有common sense：男人好說一些很抽象及虛無飄渺的東西，而為了那些無聊、抽象的東西又可以辯論得面紅耳熱、打個頭破血流。女性卻不然，她們喜歡腳踏實地去做一些普通但卻有用的事情，這是男性辦不到的。女性還十分溫柔、富有同情心、非常體貼、容易瞭解別人的觀感；男人卻往往不去瞭解，也不想去瞭解，甚至沒有興趣去瞭解別人的觀感是怎樣的。

現今社會之所以會弄致這般田地，主因之一是男性作主了差不多三十年，整個社會的競爭、暴戾，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全部是男性自己所投射出來的。男性將自己的運作方式以及所有的一切，設計成為男性的世界，因此，世界才有那麼多戰爭。相信如果將整個人類的文明變得女性化一些而又具有男性的長處的話，意即男女兩性一起發揮他、她們的長處，為這世界作出貢獻，肯定這世界將會美麗得多，無數的問題亦將會迎刃而解；因為現今世界所有的問題，大部分是男性自己的價值觀與與辦事方式所造成的。

／反省人與物質文明的關係，善用機械與工具，做科技的主人。

許多人誤以為「綠色思想」反對新科技，想把人類文明回復到原始時代。其實恰好相反，現代文明和科技走錯了路，把人當作奴隸，我們每個人分分秒秒受到科技約束、受到制度壓迫，綠色思想致力把人從這壓力中解放出來，重過自由自主的生活。

現在我們人類之所謂進步，搞出了許多的物質文明，表面看來人類十分聰明，其實缺乏了智慧。搞出了那許多的文明卻不懂得去善用，反而弄到到處都有毒，到處都有危險，簡直是自掘墳墓、愚不可及。

現在我們每天被機器操縱著：例如我們都是手錶的奴隸，每天必需按它去做各樣的事情。回到家裡必定第一時間按亮電燈、開電視機，好像著了魔似的。我們讓機器的需要凌駕於人的需要之上，例如馬路上行人個個要讓路給汽車、山川河流四面八方受破壞只為了建路給汽車走，甚至丈夫中斷床上合歡丟下愛妻、神父中斷祈禱丟下天主去聽電話，全人類可能因電腦出錯而搞出核子災難同歸於盡。這些非人生活令人失去了對生命的控制，長期無奈、挫敗。

／重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追求和諧、公義、共存共榮的關係。

除了上述個人的層次外，綠色思想亦致力透過國際、國家、社會的層次，來挽救人類的人明。現今世界上，國際間的秩序日益混亂又危險，如軍備競賽，南北兩個陣營的差距，貧富懸殊，資源被人類用盡等。綠色思想追求真正的公義，期望世界各國可以真正地去為大局著想，大家公平分配資源，用非暴力的方法解決一切紛爭，尊重弱小國家、民族。達到一種和諧的、共存共榮的境界。這個不是一廂情願、理想主義的奢望，而是人類集體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盡力保養唯一可棲身的地球，應用生態智慧，改變決策的方式。

在地球生態危機日益迫切的關頭，人類要自救的話，只有痛改前非，馬上停止破壞，凡做一切事情、計劃一切工程與生產方式，都先考慮到地球的安危，把保養這個唯一賴以生存的星球放在第一位。

挽救生態危機不單是國際機構的事、個別政府的事，還是每個人的事：每一個我們日常的行動，都決定地球的健康會不會進一步惡化：駕車還是乘巴士、吃肉還是吃素、遠足還是玩電腦遊戲、買塑膠杯還是瓷杯、穿的確涼還是棉質衣服……，這些決定間接影響到地球何時毀滅。

人人懂得用生態智慧下決定，順自然之道而行，地球才有希望。

／維護文化及社會面貌多元化，阻止文化侵略破壞及思想的單元勢力。

綠色思想也竭力維持（或恢復）文化的多元化，阻止文化侵略。

現在這世界的文化有著一個大的危機，就是「世界大同」；全世界都喝可樂、吃漢堡飽、穿牛仔褲、看美國電視一如奧運這些極之虛偽、無聊惡性競爭及商業化的東西。這樣繼續下去，我們整個的文化便會倒退。從前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多姿多采的文化特色，可是現在都像被一個洪流所淹沒，許多本來很精彩的文化全部消失了。

／盡快結束工業化社會，建構後工業社會。

人類文明的錯誤主要始於工業主義化（灰色設計），事事集中、反人性、反地球。

現在一般人有個非常嚴重的誤解，以為世上有兩類國家，一類是「已發展國家」，即所謂富裕國家；第二類是「發展中國家」。其實這名詞反映出整個觀念的錯誤。它們為甚麼要發展？現在當務之急就是叫它們千萬不要發展！倘若尾隨著這發展的模式，這世界很快便會面臨末日。

最近根據統計，香港每人每年約用七億張紙巾，試想中國有十億同胞，要是每個人都習慣了用紙巾的話，這世界上還能有一顆樹剩下來嗎？假若他們如此「發展」，開始學用紙巾的話，我不相信這地球能再多維持十多二十年。現在反而我們香港人向他們推銷現代化，教他們穿牛仔褲、吃漢堡飽、吃家鄉雞、用紙巾等，實在大錯特錯。提醒中國大陸萬勿走上工業主義的路（盲目所謂「現代化」，例如搞大型工

廠搞核電），其實正是我們香港人在這歷史關頭最重大的任務。

四、「綠色」哲學為甚麼要別樹一幟？

為甚麼會有「綠色」運動出現？有志改善當前人類處境的人士，何以不能透過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架構來實現理想？

因為「綠色」哲學所持的一套世界觀，與當前社會主流的一套完全不同，「綠色」人士相信世界弄到今天危機重重的地步，正是拜主流哲學所賜，它正是問題本源，要改善現況，非革它的命不可。

目前全球南北世界左中右的社會，全都信奉「工業主義」政治。簡言之，根據這套哲學，社會進步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有賴增加生產、提高消費，經濟不斷成長。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各國只好爭奪地球上有限的資源，採用科技的方來解決紛紛出現的問題（從酸雨和湖泊死亡到精神病和癌病。）目前主流的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都是以這種「理性」(rational) 的邏輯為基礎的。從六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人發覺此路不通，看到長此下去地球和人類社會勢必毀滅，於是提出了殊途的辦法，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綠色」哲學就是這樣產生的。

「綠色」哲學的最大特色，是致力令社會「可維持下去」，不致毀滅。「綠色」哲學提出種種「殊途」方法去徹底解決當前世界的種種危機：環境、資源、不公義、軍備競賽、健康、經濟衰退、失業、物質生活懸殊，靈性生活破壞，人生失去意義等等。這套哲學不但著眼當時，解決全球的問題，還顧及世世代代子孫的福利。

這一套世界觀跟當前社會那一套截然不同，沒有醒覺的人，往往不容易明白何以「綠色」人士這樣想。這兩套哲學背後的假設有別，從甲的觀點看，甲方的理論與做法是合情合理的、有根有據的，乙方的理論與做法是荒謬的、瘋狂的、無理性的；可是從乙方的立場而論，則剛好相反。如果你認為要盡量提高經濟生產，製造物質文明供大家消費，人類才會幸福，那麼核子發電、產品故意在設計期間自動毀壞、國際武器貿易，一切一切都是合理的，完全理性的；如果你認為只有搶救生態

環境才可維持人類文明下去，世世代代共享這個球，那麼以上一切都是愚不可及的。

在「綠色」人士眼裡，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是大搞「絕種主義」，正在加速人類的滅亡。每一次有生態問題出現，用傳統的方法去解決，即使可以一時奏效，總不免製造新問題（例如沙田不論怎樣大建濾水廠，吐露港的水質也必然繼續惡化下去），帶來新的威脅。每一次我們依靠科技新奇蹟，只不過是苟延殘喘，甚至可能令生態計時彈提早一點爆炸。誰都知道應該用其他方法解決問題，可是政治家習慣只顧面前的問題，看不到長遠的大局勢，即使看到了，也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大刀斧改革制度。世上每一個政府要不是都在為下一次選舉而做事，就是不斷為了維持獨裁統治而做事，二者都要採取短視的政策，企圖滿足人民當前的物質需要，明知是在集體自殺，無法令行不通的制度維持下去，還是繼續在做消防隊——那裡出現火頭，就緊急處理那裡的問題，暫時捱過了危機之後又置之不理。各國政府也長期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應付問題，不肯訂長遠的、真正可以解決問題的策略。

正當全球的政客埋頭打冷戰熱戰之際，近年各全球性的環境調查報告顯示出：地球生態的破壞已經達到非常危險的地步，而且沒有改善的跡象，例如土壤侵蝕、森林消失、海陸空污染、大氣裡的幅射毒害、氣溫改變等等。此外，人類當前也要解決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資源問題等。由於上述的原因，透過現存的政治經濟制度來拯救地球，是沒有可能的。

「綠色」政治不屬於左中右派，因為所謂左中右的政治派別都只不過是一條三線行車的馬路，不論是左中右線，方向完全一樣錯誤，通往災難。綠色政治是一條方向不同的路。

照一般的想法，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代表了左右兩個極端，各自組成了陣營。照「綠色」哲學的看法，這兩種主義其實相似處多於相異處，根本就是同一套「超級意識形態」的兩臂，這套哲學可以叫做「工業主義」。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有甚麼共通之處？二者同樣致力追求工業成長，增加生產，同樣相信物質供應是滿足人民

需要的最佳辦法，同樣致力追求無限量無管制的科技發展，同樣依賴越來越大的集中架構和大規模官僚式控制和聯絡協調，同樣從狹隘的科技主義理性主義觀點看世界，認為地球是要征服的、控制的、用來肆意剝削利用的，認為大的必然就是美好的，同樣把經濟放在第一位，藝術、道德、社會價值等等淪為附屬的東西。

工業主義的制度不可能解決世上的經濟問題，理由很簡單：這種制度必須依靠經濟不斷成長——更多生產、更高購買力——才可以維持下去。如果這種成長真的可以維持下去，重新製造全面就業的情況，讓全人類不斷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就勢必大量耗用資源、破壞環境。由於地球資源有限，即使能夠合理分配（跡近天方夜譚），也必然引起通貨膨脹，而且地球忍受生態破壞的能力有限，必然受不了。相反如果經濟成長無法維持，結果只會是大量失業、購買力下降，經濟蕭條，造成政治危機。科技的進步不可能解決上述問題，雖然仍然有許多人這樣妄想。

工業主義的另一個嚴重缺點是它令人疏離——與自己、與他人、與工作、與社會、與大自然隔開。把工業革命前的工作方式和社區關係與今天的比較一下，就看得出現代人何以感到人生無目的、無意義。工業化生產的成功要訣是分工及大規模生產，於是工人失去了獨自創造完成產品得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更因為變成了可以更換的大機器裡的螺絲釘而失去尊嚴、失去獨自的存在價值。人越來越多與機器打交道、受機器操縱（例如看電視代替了飯餘閒談、玩遊戲機代替了象棋打 球比賽），在制度面前無能無奈。

工業化的分工更破壞了一個個農村有人情味的社區，製造出種種「城市問題」——高罪案率、精神病、自殺、冷冰冰的人際關係等。即使近年的所謂新市鎮設計，表面上好像很文明、有條理、有心思，其實往往令居民物質水平提高、生活質素反而下降（屯門就是一個好例子），原因就是傳統的社交圈子和親密的血緣關係給硬硬分配安排規則打散了，當局「理性地」指定誰有多少家人收入多少就往那種單位，購物、工作、教育、醫療、社交分頭安排好，偏偏就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方便、親情的支持，就近找個親戚或老朋友傾訴心事非常困難。總之，當前的城市設計採用工業主義的「理性」原則，但求方便合乎數據的標準（每人住多少平方公

尺，多少家人需要一間小學之類），不懂得把人的內在需要放在第一位。

工業主義者著重集中決策，大規模計劃，齊一化的措施，這些因素處處都違反人性、令人失去了自主的能力、自我的價值、獨特存在的信心；國家或機關規模越大，個人在它們面前的影響力（也就是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越小，個人與它們的溝通越困難。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國，選舉總統時大多選民的無奈，正是大規模中央集權失敗的明證。

工業主義的純經濟與科學價值觀強調鬥爭、征服、控制，根本與和平、和諧、調和、共處的哲學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目前北方世界對南方世界的剝削、東西方的軍備競賽、各地社會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國分頭破壞自然環境令地球無法可以居住下去，都不是偶然的結果，不可能靠現存的制度去緩和或解決問題，因為這個制度本身就是問題的主要根源。

基於以上原因，「綠色」哲學的結論是必須從另一個方向入手解決問題。

五、「綠色」政治觀

「綠色」哲學提出了一套與現時流行的「工業主義」相反的政治觀，它的主要立場是：a, 地球最重要；b, 人比人造的一切（制度、主義及機器等）重要。一切安排、策略、措施都以上述兩個原則為依歸。

落實到政策的設計，在當前的世界裡，「綠色」政治著重尋找辦法創造財富讓世人共享，滿足大家真正的需要，但同時不損害脆弱的地球生命網。朝這個方向走，第一步應該是改變消費模式，把當前的「消費社會」逐漸變成「維護資源的社會」。同時，整個工商業秩序也隨而改變：減低大部分工業生產量，提高個人依賴自己的能力與可能性，分散經濟，盡量重用資源，大規模重新分配財富、土地、生產工具、改革工業化的工作方式，盡量採用及發展所有可以幫助上述改變的新科技。「綠色」政治的目標，大致是以下幾個理想的實現：

1. 減低需求、提高自足能力

自從工業革命開始，工商業不斷製造需求以開拓市場，這個正是當前人類危機的主要根源，因為它鼓吹貪婪，造成浪費和爭奪，結果導致國際剝削與長期鬥爭、地球資源耗盡、環境破壞。

人類要過合理的生活，需要得到基本的物質條件，但這些真正的需要和消費主義社會給人不斷洗腦的假需求，往往被故意混淆。要走出這個死胡同，唯一辦法是反其道而行：減低個人需求，認識自己的真正需要，減少依賴，盡量在各方面自給自足——特別是食物、能源、原料，在個人、社區、國家的層次都是這樣。

在非中央化的社區裡，這種原則特別容易實行，因為前文所述那種兩難情況——若失業問題解決，必然引起通貨膨脹、資源匱乏；若不解決，消費力下降造成經濟崩潰——得以解決：在相當程度自給自足的經濟裡，就業與經濟穩定可以魚與熊掌兼得。

2. 善用科技

「綠色」哲學不是反科技哲學，它反對的只是誤用科技及盲目崇拜科技（「科技永遠是對的好的」、「因為這是新科技所以必須馬上使用」）。

工業革命時期，新發明的機器強迫人用非人的方式生產；本世紀之內，新機器逐漸淘汰人手，帶來大規模失業；這些都是科技的惡果。同時，由於科技專家聲稱「中立」，不肯負責機器使用的後果，科技頻頻被誤用，令許多人受苦，地球被危害。踏進後工業社會，新科技應該可以繼續造福人類，例如取代沉悶非人化的工作，例如節省能源資源。

3. 追求真正的和平

在目前工業主義的制度下，全人類物慾不斷提升（北方國家耗用越來越多奢侈品，南方國家「現代化」消耗的資源急劇增加），不久將來資源匱乏是難免之事，近年

各地大大小小的國際紛爭惡化，未來勢必更多武裝衝突。

正因如此，減少耗用資源，平均分配，才是唯一的長久解決問題之法，人類和平的希望就在這裡。除了盡快大刀闊斧重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外，大量裁軍也是必須馬上實行事，因為今天各國擴軍備戰，消耗了大量物質資源、金錢（每天十億美元）、人才、科技研究成績（今天全球的科學家，約有一半人的究工作直接間接與戰爭有關）；這些若轉作造福世人的用途，已經足以抵消經濟改革可能造成的短暫生產損失有餘。

4. 恢復人與土地的連繫

近年全球各地（特別在南方世界）大城市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居住環境越來越惡劣。分散人口，扭轉向城市遷徙的趨勢，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必需對策。要消滅城市是不可能的事，但盡量給予人民動機、方便、協助，讓他們可以選擇離開城市過活，是每個政府可以辦得到的。這樣做需要許多政策配合，尤其是土地「發展」計劃配合。

更多人回到郊區居住，以上三種理想才可實現。相反，讓城市化的現象繼續，「綠色」政治理想大概永遠還是紙上談兵。

5. 強調靈性生活

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把人生的重心轉移到形而下的層面，現代工業化都市生活更處處迫使人故意或不自覺地沉淪在物欲裡，無休止地追求肉體的、世俗的滿足，忽略人生靈性的需要。「綠色」哲學提倡知足、儉樸、修和（與人及大自然和諧相處）、簡單生活、重視人性、自己掌握命運、從有意義的工作裡尋找滿足與成就感，這一切都有助於開拓個人靈性的境界，獲得豐盛的生命。

「綠色」政治和工業主義政治的分別，可以概括地用附表列出來。



「綠色」政治與工業主義政治的分別

工業主義政治

1. 科技與經濟「宿命論」
2. 侵略性的個人主義哲學
3. 赤裸裸的物質主義
4. 用簡化論方式理解世界
5. 以人類為中心
6. 著重理性與數據知識
7. 行為動機向外為主
8. 父權價值觀
9. 制度化的暴力
10. 著重經濟成長及國民生產
11. 為了交換與利潤而生產
12. 貧富懸殊
13. 「自由市場」經濟
14. 不斷擴張世界貿易
15. 需要刺激
16. 就業是手段，以達到其他目的
17. 資本集約方式生產
18. 不加思索接受科技控制生活
19. 集中及大規模的經濟
20. 等級制度的結構
21. 依賴專家
22. 代議制民主
23. 著重法律與秩序
24. 著重國家主義
25. 征服主宰自然
26. 環境保護主義
27. 把環境看成一種資源
28. 使用核電
29. 高能量能源政策，大量使用能源

「綠色」政治

1. 未來個人分別自主命運，權力分散
2. 著重合作的、比較公有制的社會
3. 著重靈性的價值
4. 用整體的、結合的方式理解世界
5. 以一切生物為中心
6. 著重直覺與瞭解
7. 行為動機向內為主，著重個人成長
8. 男女平等的價值觀
9. 非暴力
10. 著重建設可維持下去的社會，著重生活質素
11. 為了自用而生產
12. 貧富不懸殊
13. 各社區使用本地產品
14. 自給自足
15. 自願過簡單生活
16. 工作成為本身有意義的事
17. 勞工集約方式生產
18. 考慮過才謹慎使用及發展科技
19. 分散及適合人性規模的經濟
20. 非等級制度的結構
21. 大眾參與決定及行動
22. 直接民主
23. 公民擁有充分自由權
24. 著重國際主義及全球團結
25. 與自然維持和諧關係
26. 生態主義
27. 把資源看成絕對有限的東西
28. 使用可重生的能源
29. 低能量能源政策，儉用能源

六、綠色哲學進入實際政治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綠色」運動是自從社會主義出現以來最有衝勁、潛質、革命意義的政治社會運動，雖然從政治實力來量度，目前尚在萌芽階段（全球只有西德和比利時的綠色政黨真正有實力影響政府的政策。其他的只有一部分能在地方選舉裡爭取到權力），但是隨著地球危機加深和越來越明顯，世人逐漸大規模醒覺，關注環境不再是社會上一小撮人的癖好，而是多數人知道無法再逃避的急務，連政治家也不敢再忽視，各種壓力團體的行動也逐漸配合「綠色」的目標，聯合行動，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危機當前，在集體存亡的關頭，人類再沒有其他智慧比求存的智慧更大，再沒有其他工作比拯救地球更神聖。

因此，從七十年代開始，所有政治家其實都在開始「變綠」，只不過他們絕大多數被自己向來投身的工業主義所困，看不到自己所設計推行的政策，如何與地球的拯救背道而馳，如何加深危機。

綠色政黨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奇怪政治組織：它們革命成功（地球得以維持下去）後，必然不再存在，因為到時所有政治家，所有政黨都是綠色的，「綠黨」再沒有存在的需要。當前人類的問題不是能源將來不夠用，糧食將來不夠餵飽所有人，而是能否及時避過集體毀滅的災劫。

今天，男女老幼人人都有一個重大神聖的使命，讓地球可以繼續適宜人類往下去，給子孫生存機會。人類踏進後工業社會，「綠色」哲學提出了建設新社會的目標、原則、藍圖。我們不能繼續自私地「先使未來錢」，希望子孫還有辦法及時收拾殘局。地球興亡，匹夫有責。

「綠色」哲學是理想主義加務實主義的混合物，其中有遠大的眼光和理想，也有許多普通常識。它不是石破天驚的偉大新理論，而是充滿現代工業主義社會裡被埋沒了的古老智慧，這些再拿出來應付當前的危機正好用著，因為我們早已給科技簡化論和物質主義沖昏了頭腦。

七、「淺型」、「深型」綠色行動

保護環境思想漸漸成為了潮流，各地紛紛有打著這旗號的組織出現，這類組織其實有兩類：一是「淺型」生態關注團體，一是「深型」生態關注團體。

「淺型」的生態關注團體主要把活動集中在應付表面現象方面，用治標的方法，做局部「補鑊」功夫，例如改善某條河的水質、阻止某區工廠污染空氣、保護某個樹林、搞玻璃瓶及廢紙循環再用、反對拆卸古蹟、努力美化居住環境等等。這些功夫本身都饒有意義的，很值得去做，但是這類團體往往替現存可怕的制度粉飾太平，轉移了視線，令大眾受到蒙蔽，以為這樣做已經足夠，以為沒有其他可行辦法，結果反而妨礙了真正需要的改革。

「深型」的生態關注團體卻由大處入手，用治本的方法從最基礎的地方做起，喚醒大眾對抗工業主義，日常生活處處以挽救地球為大前提。「綠色」運動的真正意義就是在這裡。

從「淺型」進化到「深型」的生態關注精神，需要本文所描述的醒覺——明白地球的當前危機及其原因，需要決心與毅力從自己做起。若不把信念落實，「綠色」人士不但難以教其他人信服，自己也無法深入瞭解行動的意義與可能性。所以，善行從家裡開始，自己生活方式的轉變，是關注環境的第一步。

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已經不斷有人逐漸覺悟，明白到當前西方文化帶頭的物質主義「發展」取向的社會，不但不能為大家帶來幸福的生活，還促使整個人類文明直衝向永遠的毀滅。這種內心的轉變令億萬人開始樂於減少消費、改變人生追求的目標、改變生活方式、重視與人的交往、重視靈性生活、重視與大自然的溝通，從這一切中得到長久而深度的喜樂，生命恢復意義與方向。

如果這種改邪歸正的行動及時普遍化，人類說不定看到拯救的開始。

我們還有沒有前途，決定於每個人能否化悲情、恐懼、擔憂為力量，改變自己，改

變社會。

大家若不這樣做，地球無法得到拯救，我們齊齊做歷史罪人——只因為怠情、自私、懦弱。真正關注生態（愛護地球）是愛護生命的首要條件，這就是「綠色」運動的信息。

1.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Jonathon Porritt,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政府硬推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工程，破壞生態及海岸生物的棲息地，十多個跨界別團體成立「守護龍尾大聯盟」(2012.11)
圖片來源：主場新聞

綠色運動是甚麼？ 綠色甚麼運動？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周兆祥
流動生命主席

1987年，阿祥發表了一篇文字，叫做〈為甚麼「環保」已經落伍？〉，呼籲大家勿再「講環保」、「做環保」。當時港府仍然未承認本地的環境有污染破壞的危機（直到1989年才公開宣布確有問題，會動手致力改善）。

環保的「原罪」

為甚麼切勿著眼於「環保」？因為明白內情者總會看得出：所謂「環保」，無非是建制的虛招，聲東擊西轉移視線，企圖維持現狀，讓商家繼續剝削大眾破壞地球發大財、政界繼續以灰色文化統治，其他各界繼續過灰色生活——這一切才是地球生態崩潰的真正根由。

只要以上幾個「繼續」繼續下去，人類文明必然繼續墮落……直到有一天地球忍無可忍，將我們集體驅逐離場（以近年【特別是1992地球高峰會後各國的態度反應】形勢看，末日果真近在眉睫了，而世人竟然若無其事）。

人類若有未來必然是綠色的

「環保運動」(environmentalism)原是1970年代的產物。到了1980年代，各地有眼光的綠色人士已經將奮鬥的範圍擴大，不再著眼於「環境補鑊」（搞污水、垃圾、噪音、空氣，保育郊野等等），改為「治本」——轉化世人的思想，令大家因而改變價值觀，改變生活方式。

於是阿祥和朋友們開始推廣全面的生活態度與習慣革命，包括綠色保健、綠色飲食、綠色教育、綠色建築、綠色傳媒、綠色城市規劃、綠色法律、綠色政治、綠色藝術、綠色人生事業、綠色節日、綠色交通運輸、綠色旅遊、綠色科技、綠色農業、綠色商業、綠色經濟、綠色家居、綠色育兒等。因為這一切始終是環環相扣，必須整體綠化，互相配合，才有可能真正減低灰色文明的禍害。

記得在1990年代我們提倡上述這些概念時，社會的反應一如預期至為冷淡，大家不知道這些和「環保」有甚麼關係（當時根本連「環保」也未成為一般人心目中的問



題)，不明白為甚麼要推動這些生活方式的改變（例如少吃西藥、少吃肉、多多親近大自然、少浪費食物、多自己生產食物、有機耕種等）。

還是等到二十一世紀降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綠色浪潮洶湧澎湃，本地社會才陸續醒覺，加上其他有關的因素（例如大量移民及留學生回流定居帶回彼邦的綠色意識和生活習慣、綠色科技成熟普及、外地各國執行嚴格的環保法例影響到本地的工商業），幾乎一夜之間，我們社會大眾日常生活處處開始綠化，包括接受有機產品、公民社會致力保育環境生態、商界普遍以綠色作招徠、民間開始擁護自然的醫療、法例引進綠色的成分等等，連政府亦加入宣傳綠色生活了（即使仍然流於表面化）。

集體生死存亡的最後掙扎

「環保」與「綠色運動」的分別主要在於前者企圖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勢力（包括特權霸權與意識形態），由他們逐步逐步在不能自己的情況下稍為改動運作方式；後者則從最根本的思想入手，肯定灰色文明大錯特錯天地不容，致力徹底改變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過程中無可避免動搖到既得利益者的霸權。

如果只是做「環保」，破壞地球的主因未觸及，情況必定惡化下去，產生骨牌效應，末日將近。「綠色」的轉化在智慧策略的主導進行，加上好運（上天決定吾人命不該絕），或許仍有一線生機。

未來生機在你我手上

說到底，這場「最後的革命」不成功就集體滅亡，關鍵在於世人心的轉化，大家重訂幸福的意義和人生的責任，以及自己作為地球太空船乘客的身分。我們推動這場轉化，無非是移——風——易——俗。

以此衡量，過去二三十年的努力已經陸續開花結果，雖然很少、很遲、未必顯眼。這是唯一的出路，究竟有沒有生機，就看大家的造化罷。

人間若有真未來，一定是綠色的。



Suzanna D

WELCOME

可持續發展

| 文思慧

2004

「可持續發展」被發展主義的全球貿易議程拖往維護建制的道路；非政府組織對發展主義若然批判不足，便直接或間接與企業集團形成了「夥伴關係」——不論要「善化」企業集團或「反對」它的「不公平」作風，都令兩者輕易變為一種依存與被依存的關係。

2013

「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擴張板斧，得各國政客政府支持，大派可持續發展基金給社企或撥款各大學部門搞可持續發展研究，大家至今已耳熟能詳。然而環境改善了嗎？沒有。貧窮解決了嗎？沒有。第三世界社群更因被捲進全球化貿易而生態資源被剝削（變賣「家產」）及喪失自給自足能力。

今時今日全球推動「減碳」不遺餘力——比往昔鼓吹「可持續發展」更熾熱；「減碳」被挪用來推銷核能，實在是毫不出奇的事。

可持續甚麼？——誰敢在生活中思考環境議題？

思·88期 | 2004年1月

| 文思慧
民間學者

「可持續」不一定是好的，但近年流行以「可持續發展」取代「環保」、「綠色」，彷彿必是一種正面價值——即「發展」是舉世國家的追求，毋庸進一步檢討。

1987年聯合國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又稱《布倫特蘭報告》），勾劃出「可持續發展」的藍圖，除了討論全球性各種破壞環境情況，也高舉了兩項原則，一是不讓後代的需要因我們這一代的花費而給抹煞掉，二是優先關注貧者的需要。這兩項原則正正將之前南北（貧國與富國）就「環保」議題的矛盾兩方觀點分別納入，第一項原則道出富國要「保護環境」，第二項道出貧國要「追上富國」這一個發展的要求。可是，兩個原則是機械的相加以便將世界各國代表都拉到會議桌上來談環保，本身並無任何辯證的批判與實踐的歷程去帶出新視野。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環境高峰會」正是這種人頭湧湧但毫無貢獻的環境會議，其失敗早成定案。關鍵（污染）國家不肯簽關鍵條約——如美國為著維護其榨取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的生物科技工業，不肯簽署生物多樣性條約；而北方國家答應幫助南方國家改善環境的撥款，根本就口惠而實不至。固然，有些國家的城市或地區的有心人會嘗試應用一些簽署了的條文（如《議程21》中的條文）來敦促自己的政府去履行一些責任——如省電、回收之類。但總的來說，會議不但結果無約束性，還製造了機會給商界（大集團）宣揚其「關心環境」的形象（greenwash）。接下來便是它們不單主導了「環境」論述（如集中在「環保技術」、「資源管理」種種新「投資項目」，而各政府在立例方面更作相應配合，保障了該等投資的回報）；這些財團更藉著「可持續發展」的大前提，名正言順地將跨國貿易視為「發展」所必須，將《布倫特蘭報告》中關注貧窮的原則騎劫過來，令全球化貿易成為「減貧」的主要途徑。

2002年在約翰尼斯堡的第二屆「地球高峰會」前後期間，與會者將商界參與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宣揚為一大盛事，一時之間「蜆殼」、「加德士」都成為環保英雄。儘管會場外有異議之聲——大量來自各國的非政府組織的組織者要揭露環境不公義及種種相關的不平等；然而，這個非政府組織界別的人士，能夠從深層(radical)的角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度，去抗拒蘊含著跨國貿易的「發展」路向嗎？

事實上，打從1992年之「高峰會」文件協議起，參與國早已將所謂「體制改革以達脫貧」之「發展」方向，約化為將貧國進一步拖進國際貿易網絡中。（註）各地的非政府組織雖對「全球化」有所批評，但遇到可持續發展、環境等討論場合，卻往往未能乘勢對蘊含國際貿易的發展路向窮追猛打，令人深覺惋惜——因為深層地檢討、批判發展主義，最佳的場合（黃金機會）之一就是能夠正面指出「地球根本不能承載人人富裕」的「發展」目標。錯失良機，便很難避免滯留在既有的發展主義框框內，避重就輕地將「公平」加入國際貿易中（如樂施會近年的口號），結果不但地球不能承載，連「脫貧」也只是過眼雲煙（只是將代價轉嫁到生態、後代子孫、其他地區的人民身上）。

例如「公平咖啡」的口號雖漂亮，但農民不種植自己及社區所食用的農作物而希望藉著「合理」價格去賣咖啡以取得生活保障，正正是交出本土知識、文化、經濟、生態之自主權，埋下日後在全球化中全線崩潰之伏線。

「可持續發展」被發展主義的全球貿易議程拖往維護建制的道路；非政府組織對發展主義若然批判不足，便直接或間接與企業集團形成了「夥伴關係」——不論要「善化」企業集團或「反對」它的「不公平」作風，都令兩者輕易變為一種依存與被依存的關係。依存的前提正是上面說及的發展主義，特別是它所意含的消費、生產、棄廢行為在成本效益與比較優勢的計算中，嚴重地分離（即是在全球化中作「分工」處理）。這趨勢在發展的旗幟下迅速蔓延，持續地製造「眼不見為『乾淨』」的「環保」模式（我的消毒正是他人及環境的中毒），及為不斷升的消費狂潮所製造的（在貧窮地區的）災難持續撥火添油；而非政府組織也就在場災難中持續有工開！

故深層的問題正是：非政府組織是否真正相信人的自決，及因而敢於追尋一個非發展主義和令它們的組織自身終於解體（不再需要這些組織當中介者）的未來社會？

假若如此，非政府組織所要倡導的，就必須遠離現時可持續發展的主流論述，更要正面回擊香港各界合力將可持續發展之最因循建制一面之發揮——就是那主張平衡經濟、社會、環境之（現有的）價值觀，實質是一切不變，繼續追求消費與富裕，而視環保與社會福利為輔助、恢復個人在消費與爭取富裕方面的條件和能力。非政府組織在另闢新途方面要敢於與人民一起接受衝擊：事實上，一個社群真心追尋可持續生活遠比追尋可持續發展艱難，因為這個社群要重新清楚反省自己需要些甚麼，那些東西是怎樣生產出來的，過程中和消費後產生的垃圾和污染是如何處理的；最重要的，是當中如何不去轉嫁禍害給他人和生態系統。

這些組織在譴責「全球化」之際，也要對本土經濟、社區共同購買等這些它們會策劃的項目，有長遠而真心的投入，而不是以之為紓緩失業、幫助參加者增值以重投人力市場的暫時措施。早前就有某社會服務機構的「有機農場精神復康計劃」負責人稱：參與的成員在本地有機農場工作是為日後重新恢復「正常工作」而鋪路。而社會上的「正常工作」與精神病發的關係，大家卻視而不見。

一個社區能夠對消費、生產、棄廢的整個權力與生態流程作出重新檢視，盡量接近本地消費、本地生產、本地棄廢的倫理與生態可持續性的目標，所須發現及再發現的本土知識、能量與價值選擇，實在多不勝數。「全球化」也許是個很容易的攻擊對象，但要建立「本土化」所須的視野重構才是真正的挑戰。

一個例子是，大家在跟隨早已坐擁維港海景的大財團去反對在中區、灣仔繼續填海的同時，又可曾關注到，可持續的農業生活（生產吃不壞人又不傷環境的農產品）所需的河道，和調節各區居民所呼吸的空氣的各區海岸與其他水體，在那些反對維港繼續填海的大發展商的各項「發展」計劃下，早已遭到破壞或瀕臨消亡？也許，政府發行的郵票，旅遊協會宣揚的「香港歷史勝跡、特殊景觀」，都選擇了聚焦於維港，但這選擇不一定是所有人的選擇——大家在各區生活、成長，也一樣有當地的歷史遺產和令人投下深刻感情的景觀需要保護。這些，也需要配合當地的生產、棄廢情況來重新構思，不能一切由中央舞動的消費主義、發展主義大旗來取代。也就是說，承托著持續消費、追尋富裕之炒地產、推高樓市及其他的泡沫經濟活動，



將各地的本土特色、本土關懷、文化與經濟自足的想像與實踐都夷平掉，剩下來的只是一片自然生態暨人文生態的災難，這些，並不會因可持續發展口號一直講下去之喧嘩而得到扭轉。

註：

《議程21》之第二章就接受了全球貿易之「貿易自由化」方向，並以之為發展中國家增加出口，改善經濟的基本假設條件。《里約熱內盧宣言》中之原則第16項更指出可運用經濟工具去將環境代價內在化，但過程中雖然要照顧公眾利益卻不能「扭曲（既有）國際貿易與投資情況」。

參考：

<http://www.worldsummit2002.org/memo/memomain.htm>

Tears of the Crocodile: From Rio to Re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 Middleton, P. O' Keefe S. Moyo, CO: Pluto Press, 1993.

The Earth Summit Agreements: A Guide Assessment. M. Grubb et.al. London: Earthscan, 1993.



跨國企業撒下的綠色羅網 ——從「可持續發展」賣 全球化經濟到「減碳」賣核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 文思慧
民間學者



「可持續發展」：小試牛刀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聯合國 1987年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下，正式啟用作為全球關注環境的方向。打從第一天，這方向對「發展主義」下的發展模式從來不作批判，富國追求全球參與環保讓它們的「發展」得以持續，為了安撫貧國，讓後者也參與其事，便將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焦點移往第三世界——就是將既定的發展模式套到貧國中去。但這正就是跨國企業主導下的全球化經濟延伸往貧國去之意，又那裡來可持續性？以本土生活為基礎的生態及人文關懷世界的持續，與這只以「本地生產總值」(GDP) 所顯示金錢價值所界定的發展模式根本不能共存。

故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結果，不但不環保，還把環境尚未破壞淨盡的第三世界地區網羅進全球化貿易下的高度環境破壞中。這虛假而荒謬的可持續發展陳腔濫調愈演愈烈，二十多年來透過在全球的教育與宣傳（教育與宣傳其實二者為一，近年本地的流行稱謂是「洗腦」），甚至騎劫了環保意識所可能引伸的公民對建制的批判；於是在它的旗幟之下，一代代人自以為有了國際意識、綠色視野，便更理直氣壯地投身於企業掌控之全球化浪潮中。

以下以膠瓶回收再造來說明。

膠瓶回收再造被宣揚為又綠色又製造就業，即可提高以增加GDP來界定的發展，所以在發展主義的前題下，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心水項目。

然而，這正正就是讓大家不從源頭質疑為何有如此多的膠瓶——這石油工業副產品的生產繼續在全球激增。於是，大家便可心安理得地繼續使用和棄置這類膠製商品，更以之為反映了國家GDP增長及社會的發達。加上所盛載的飲食（如果那些商品還稱得上是飲品食品的話）乃工業／加工業製造出的即食易儲存的化學甜飲、合成食品；這種企業掌控局面甚至連水也被壟斷得只有裝在膠瓶裡的才讓人覺得適合飲用……結果，本來簡單的無／低市場價值（因由自家或社區生產甚至天然得來）

的飲食，便改為由內（容）到外（包裝）都可計算在GDP內，並配合著石油副產品工業遍地蔓延。飲食這本來是取自天然（也可還原天然）的過程，就此演變為企業生產過程中將天然營養除去以便長期儲存及長途運輸，及加糖、加各種添加劑以補充（失去了的）味道、加色素以掩飾飲食已失去原色而只是合成物品，或添加令人增加購買意欲的顏料，再加上防腐劑、各種營養補充劑……種種等等，卻都是製造就業與提升GDP。

然後這樣的飲品食品令人生病，醫療企業及大藥廠的生產便更趨蓬勃，而愈多長期病患者，就業與GDP就愈是提高。至此，再加上膠瓶等的回收業績，就真是發展路上的節節上升，可見膠瓶等的回收，確是鞏固與「証成」企業主導的發展主義的絕妙案例。

由此再轉入膠瓶等的回收後之再造工序，在生產過程中（諷刺地）必然大耗能源——包括將回收物品清潔、切割、壓縮、長程運輸至某些第三世界某些角落……然後在再生產過程中又製造大量污染。結果引生了的疾病及要處理的污染，又是提升就業與GDP的機遇了。

「減碳」：大張旗鼓

「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擴張板斧，得各國政客政府支持，大派可持續發展基金給社企或撥款各大學部門搞可持續發展研究，大家至今已耳熟能詳。然而環境改善了嗎？沒有。貧窮解決了嗎？沒有。第三世界社群更因被捲進全球化貿易而生態資源被剝削（變賣「家產」）及喪失自給自足能力。

舊招未已，新的又來，跨國企業全面掌控人類生活的野心不止，這回目標是更基本的層面——能源。化石能源逐漸被唾棄，第三世界社群與已發展國家一些社群透過（更多地）採用地區性再生能源達致自主生活，企業更要施以回打壓；核能這自三哩島與切爾諾貝爾核災後已瀕死之工業，可以怎樣起死回生——至少向第三世界繼續傾銷？都是企業要持續甚至擴大掌控能源生產與消費所面對的「挑戰」。



先簡單說明何以電力公司對核電有所偏愛。原因（除了配合有關國家或明或隱的核武發展而獲大幅津貼外）包括：

- 1.以核電取代化石能源之「政策」可替電力公司延長化石能源工業的運作，因為興建核電廠需時多年且耗費大量化石能源，要用來做替代能源更需要很多很多（根本不可能達到）的核電廠，有專家估計連同補替退役舊核廠計算，這「政策」意味全球每天需啟建一座新反應爐。
- 2.核電屬大型而中央操控項目，故用核能保證能源繼續由大企業控制，阻礙社群自主生產能源（再生能源項目）。

在這背景下，我們實不難瞭解「減碳」為何被合時地帶到台前，在全球教育及宣傳中大出鋒頭，而由此為能源企業展開服務。^[註]

今時今日全球推動「減碳」不遺餘力——比往昔鼓吹「可持續發展」更熾熱——展現在普羅大眾眼前的是極盡煽情之北極熊屍骸、（貧窮地區）島嶼居民遭水淹之預言、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呼籲減碳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不斷召開的國際氣候大會……然而，仔細一看「減碳」的國際與地方實施，便可知只是連場鬧劇，其中最顯著的「代表作」就是跨國「碳交易」。

打從1997年訂定的《京都議定書》，各國即同意以「碳交易」減碳。然而，為了能夠通過供求機制確定碳交易的市場價格，便需要一個上限——所謂「總量控制和交易」。如果其他國家沒有完成減排義務，而不得不購買碳排放證書，減少了碳排放的國家便由此獲得資金補償。儘管如此，反過來也同樣適用：如果一個國家顯著減少了其碳排放量，那其他國家承擔的減排義務就要少一些。而如果每個國家都完成了減排義務，就沒有證書交易（大做碳買賣生意者——往往是污染企業衍生出來的公司——就沒法謀利），所以不予鼓勵。可見從一開始大家就應該心知肚明這個最低義務遊戲不會有任何效果，只是連串由污染企業自導自演讓自己多重謀利的把戲而已，各方面的心思與動機都與環保及氣候保護無關。但是當時即使綠色和平和

世界自然基金會等國際環境組織也倡導使用這種「靈活機制」。

同理，「減碳」被挪用來推銷核能，實在是毫不出奇的事。過程如下：

早在1997年《京都議定書》條文中，大門已半開半掩讓核能可以自生意之低谷伺機重起——只在2008至2012年實行第一階段，不將使用核電計算入發達國家的減碳額中，就即是在2012年後，增用核電便成了理直氣壯的減碳行為了；而這個2008至2012的暫緩期限，根本就不適用於其它非發達國家，即是等於大力鼓勵這些國家讓核電大規模上馬。

接著在2007年12月峇厘島聯合國氣候改變大會上，「清潔能源技術」和「零碳經濟」的術語寫進了大會文件，並得到各方的普遍接受。這些術語起源於企圖將核電和「碳捕捉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電站提升到再生能源的氣候保護層面的語言庫。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亦將核電當作減碳能源。原定在2011年《京都議定書II》正式通過CCS和新建的核電廠為保護氣候的清潔能源技術，但估計因福島核災之故未敢在這麼短期內引起公憤，故2011年只通過了CCS，暫時看不到核能榜上有名。

整體來說，「核能清潔、減碳」這個大謊言就是在如此龐大的跨國動員背景下產生的。其全球文宣工作在香港並無例外。

核能不單被描繪為發展所必須，少少鈾生產多多能源，更有多方合作大力打造其清潔形象，而「清潔」就在舉世減碳動員下被界定為「等同減碳」（僅此而已）。在香港，或許比其它地方更甚，這謊言廣泛而無孔不入地深入大眾意識——透過教科書、大學學者、科學館、天文台及各政府部門舉辦的公眾教育項目。這些長久而持續的工作，在一片減碳聲中成功埋葬對核能的基本認識（無法將可達二十四萬年不滅的傷害生命的輻射廢料穩妥收藏），甚至縱使無法治理福島核災（包括無法處置在出事反應爐儲存的核廢料——用過的燃料棒）的實況發生後，連本地環保團體都不會要求廢核——關閉距港50公哩之近的大亞灣 嶺澳核電廠，以及停止正在廣東地





震帶上興建的台山、陽江核電廠工程；它們只是引導大眾將「反核」扭曲為要求參與監察、要求擴大疏散演習範圍這些與核集團對耍的花招上。

賣核與減碳動員之間的罪惡關係至此已相當昭張，清楚可見減碳在今時的論述中並非真正關顧環境，甚至並非真正關顧減碳——因為連核能不減碳這個最起碼的事實也被隱瞞起來：核電生產的前期至後期工序（由採鈾礦、煉製燃料、建廠至核廢料長期冷卻及儲藏等等）都大量耗電，而核廠長期排出用完的冷卻水則會令鄰近海水升溫，既影響生態，亦對全球暖化「十分有貢獻」。（詳見「反核之眾」編撰的《核能基礎答問》<http://www.greenpartypost.net/nonukes/QandA.html>）

全球減碳總動員只為跨國企業服務，然而也有透過碳交易和類似當年可持續發展基金撥款支援社企項目的種種方式，拉攏與收買一些（分餅屑給）民間團體。真心關注生態與人文環境的可持續性，要消滅溫室氣體（二氧化碳只是其中一種）帶來的傷害，在閱讀全球和本地一浪接一浪的綠色口號與「運動」時，能不小心辨清乎？

[註] 或問：即使企業有心，為何政府總是鼎力支援，與大電力公司攜手同心？實情就是，煤、鈾、石油和天然氣儲量都是集中的——這些燃料從儲存地區被長距離運到發電廠和煉油廠，然後輸送給幾乎遍佈世界角落以億計的能源消耗者，因此，要成功營運國際化的或跨國合作的大型能源系統，從而不允許能源流有任何中斷，必然意味著能源集團與政府間的相互需要、緊密合作關係。就即政府變成了核能和化石能源行業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所謂政治能源混合體。

參考書目：

1. Scheer, Hermann: 《能源變革：最終的挑戰》王乾坤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
2. Mander, J and E. Goldsmith eds. *The Cas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or a Turn Toward the Local* (San Francisco : Sierra Club Books. 1996).
3. 小出裕章：《核電是騙人的：核工學者的真實證言》陳炯霖譯（台北：推守文化，2012）。
4. Middleton, N, Ph. O' Keefe and S. Moyo. *Tears of the Crocodile—from Rio to Re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London & Boulder, Colorado: Pluto Press. 1993).



「核能對誰都不好 - 全球廢核香港行動」集會 (2012.3)

圖片來源：蔡建誠



中國宗教政策對 香港未來的衝擊

| 劉子睿

2013

比較《思》第三十七期筆者的文章，相隔了十八年再一次細閱，筆者深深覺得教會目前的形勢，更加險峻！十八年前，筆者用了「不甚樂觀」的字眼，今天可能要用「相當悲觀」才足以表達筆者的擔憂！不過在悲觀之餘，筆者在近幾年發現了一個現象，仍然令自己感到香港的信徒群體，並不全然是被「官方」思想所盲目地引導或「河蟹」，那便是有體制組織以外的「非官方」群體，不斷地在發聲，成為一股新的民間力量，特別在社交網絡上，這些聲音給我非常有力的鼓勵與支持！

因此筆者又會轉念想到表面上教會好像不發聲，被統戰或「河蟹」了，但另一方向肯定有一群信徒，堅決地拒絕跟從「官方」主流聲音，繼續以民間或半地下的姿態去發聲，令整幅圖畫又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狹縫中冒險奮進的信徒群體：中國宗教政策陰影下香港教會出路的反思

思 · 37期 | 1995年5月

| 劉子睿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講師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九七將近，香港教會（不論更正教與天主教）已經作好充分準備了嗎？就筆者過去觀察所得，在尚有不足八百年香港便回歸祖國之際，似乎在不同層面及機制上仍未有孕育出足以代表逾半百萬信徒心底聲音的領袖或相應團體，這難免使筆者不禁對九七後的香港教會抱著不甚樂觀的態度。話雖如此，在面對九七後中國宗教政策所帶來的陰影與不明朗因素，香港教會除了如本期《思》另一位作者余雋瑞所言「pray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外，還可以有其也方面的實質準備嗎？

本文嘗試大膽地以「在狹縫中冒險奮進的信徒群體」作為反思的焦點，從三個互相關連而著重點不同的角度，去繼續探索九七前後香港教會的路向。好讓各方教牧前輩同道友好在欠缺現代水晶球的「苦況」下，能夠有所參詳並且有機會就此提出討論及回應，激發起全港信徒更加積極地摒棄「駝鳥心態」，身體力行地來迎接這歷史關鍵時刻，共同承擔我們不應逃避的重大使命。

狹縫中的生存藝術

回顧過去數十年中大陸教會的歷史，實在是有一些地方令到香港信徒產生惶恐、驚慌、疑惑及不安穩的感覺。當香港教會中的移民潮尚未減退之際，餘下的信徒或許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挑起教會中因移民產生的領導空缺這擔子，並且加緊步伐去學習如何於狹窄的空間中生存，和回應這種限制。

正如林瑞琪在本期《思》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的宗教政策在八九民運之後並未有明顯的寬鬆跡象，一方面是放寬「壓制」而同時另一方面又要加緊「控制」，這樣的政策自不然會使教會領導階層有難於適應的苦惱。按表面法理來說，九七以後在特區政府管治下，香港教會根本無需擔心，應該坐享「五十年不變」的「優惠保證」，對「一國兩制」的切實執行深信不疑。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九七前北京政府在多方面都積極地「干預」香港的種種事務，甚至引起香港教牧同工對「統戰」的擔心（可參看《思》第三十五期 教會迎向九七的策略 一文，頁34），或許「五十年不變」到頭來也只不過是一個不攻自破的神話吧！

迎向中國素有傳統的龐大「統戰」機制，香港教會不能不深思本身過去的培育系統，有沒有足夠的訓練去扶助信徒適應這樣的轉變。當我們的說話及行動隨時都會受到檢視或監察的時候，我們是否便會「自動調節」，以「識做」為原則呢？若果「識做」並非我們的行事為人原則，那麼在壓力下我們如何尋覓教會當行的路呢？個人及群體如何在敏感的氣氛下去表達信仰呢？在此我們不禁要承認在過去香港教會並沒有刻意地培訓信徒過渡九七，否則很難解釋為何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那麼多信徒選擇移民這一條路！故此筆者提倡「技巧」地在狹縫中尋覓生存的空間，而同時在原則性問題上保持自身的立場及尊嚴。這說來好像有點空洞，但亦正是這空洞之處反映出任何具體方案都會惹人注目，而限制了方案本身的落實推行。

冒險的精神

筆者傾向於九七後香港教會先知角色會受到較大壓制的這種看法，甚至國內的神學界人士亦對「打開大門，衝上街頭」的信仰表達和「對抗」的福音使命提出質疑（可參看《金陵神學誌》1994年第二期 也談對「香港1997」的神學思考 一文，頁18）。這方面國內的神學「關注」促使我們明白到香港教會的神學討論亦已在被檢視的範圍，顯示出我們身處的狹縫是愈來愈緊逼，教會是否將會完全喪失了對社會上任何不公義的現象提出批判與挑戰的空間呢？

筆者感到這空間是有多種層面和意義的（特別有關這方向的討論可參考陳慎慶之 公共空間、市民社會與基督教會，《思》第二十六期，頁16-23），而筆者會覺得內在心靈的空間與外在社會架構上的空間是有一定的相互影響關係。教會內不可能每一位信徒都走上街頭吶喊抗議，但若每一位信徒在心態上都僅是躲藏在教會大門之內，漠視社會上種種問題，則無論政府有否直接或間接壓制，教會存在本身之意義便已是一個極需要正視和反思的基本信仰課題。

在教會大門內「活動」了三十多年的筆者，愈來愈覺得香港的教會是失卻了一種「冒險」的信仰精神（而這批評同樣應用於躲在教會大門內又更同時躲於大學門檻內的筆者）。建制架構保障了好些人士的權益，但卻沒有深切地擴闊社會上的言

論、行動和個人方面心靈、思想上精神的空間，教人在相當程度上是被動地接受了「五十年不變」這空虛的承諾，並企圖天真地以盡量不變來換取九七後的生存空間。這被動的策略和心態反映了教會本身不少深層的問題，那用腳來「投票」的一大群教會「中堅分子」，始終是某種形式的「控訴」（他們可以怎樣選擇呢？他們的無奈又可以向誰傾訴呢？。當教會的培育系統未能鞏固信徒去正視社會變遷的衝擊時，他們因著對未可知的將來產生恐懼而四散奔逃，他們還應該備受責難嗎？當教會失落了為信仰而「冒險」的精神時，教會便很容易退化或衰減成為一個只懂得關心自我如何生存的組織，無法再有蓬勃的活力去體現福音精神，而「他者」(the other) 便不再成為教會關心的基本重點。

「冒險」的信仰精神，補充一些來說，乃是指敢於回應上主的呼召，在不同的崗位及處境中去探索新的路徑，實踐上主的旨意於人群之中。故此，筆者很強調和重視香港教會在跨越九七之際實在極需要把握機會，盡量勇於嘗試去開闢新的蹊徑，在不同層面的領域上去實踐信仰及反思信仰的內涵。以筆者在神學教育方面的接觸和聯絡，深深體會到一件痛苦的事實：就是教會很多時候都並不開放，即使沒有九七的陰影和壓力，教會內也存在著封殺「異見」的情況。這種悲哀的慘情，往往使很多教會內的「有心人」黯然離開，或被置於邊緣的苦況。沒有開放的「冒險」精神，我們怎可以期待教會可以提供助力去建設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呢？今天我們的教會願意在治理架構、牧養機制、信徒栽培及神學教育模式開放多一些，敢於「冒險」地踏進未知的領域嗎？

不斷奮進的信徒群體

筆者在翻閱施耐達 (Howard A. Snyder) 的《奮進的衛斯理與教會更新之模式》(The Radical Wesley and Patterns for Church Renewal) 一書時，對書內所提到「奮進」的觀念感到十分有興趣。施耐達洞悉到一種植根於基督信仰的群體，在歷史中因著不同處境而對有世俗化、制度化等傾向的教會作出回應，諸如聖方濟各 (St. Francis of Assisi)、依納爵 (St. Ignatius of Loyola)、瓦勒度 (Valdo)、門諾 (Menno Simons) 及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等所興起的，都屬於強調「奮進」(radical) 的群體，敢於在

傳統建制教會體系下努力開創傳揚福音、實踐基督精神的改革更新方向（參看施氏一書的中譯本，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頁158-179）。這些「奮進」的群體在起源階段時都受到壓制甚至逼迫（特別是瓦勒度派和門諾派人士），不過最終在基督教整體歷史發展裡都大致上被肯定及推崇，獲得「平反」及名垂千古。較為現代的例子（施氏一書未有提及的），筆者則會列舉出拉丁美洲近三十年來冒起的「基督徒基層群體」（一般簡單稱為「基基團」），其震撼力相信令不少拉丁美洲的獨裁政府都感到頭痛和棘手。

筆者無意去推動一種「殉道者意識」，只是想指出今天的香港教會若不珍惜機會，去重新凝聚及建立有使命感的信徒群體的話，則無論未來中國是否會施加壓力或限制，教會本身都會隨時陷於容易被分化的危機中，各自為政，失落了團結共同服務香港社會的遠象。故此香港教會的「奮進」運動，本身並非是要刻意地與中國對抗。基本上乃是一種自我覺醒的更新運動，希望信徒群體可以有深入的信仰反思，激勵信徒們在實踐信仰方面能夠邁步向前，不流於自我封閉，反而放眼於對整個香港及中國社會有承擔，願意落實地關心社會上草根階層的需要，不會只懂得空喊「平安」。信徒群體的重新凝聚便又自然牽涉到牧養模式、培育機制等基本課題上，這更需要教會內上下一心的共同參與和投入，弟兄姊妹之間坦誠、真摯、開放和實務的溝通。在第十六期《思》中，有多篇文章討論到「講真話」這嚴肅的課題，筆者自不然聯想到在今天的香港教會裡，有多少人敢於和慣於「講真話」呢？連教會內的問題都難於啟齒去提出質疑、批評乃至改善，我們又何來道德勇氣去對社會上不公義的現象提出異見呢？

「奮進的信徒群體」或許是要經歷過風雨才會催生出來的，我們在安逸的生活裡很難逼使自己「奮進」，去追問一些信仰的基本問題。沒有人會盼望九七後香港有劇變，但無論如何，今天的香港教會栽種些甚麼，明天便要預期我們將會收割些甚麼，筆者的看法是我們要有非常充足的心理準備，去為未來作出群體的承擔 (a communal responsibility)。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的抉擇，都不能逃避將來歷史的審判，中國政府未必會審判我們，但廣大人民的雪亮眼睛會記錄著這一切；教會今天的言行，都會在人民的記憶中，我們期望些甚麼呢？

結語

筆者在撰寫這篇文章期間，心靈確實有著不少的掙扎，除了在理論架講上未能建立起較有系統的闡述外，一些敏感的課題也曾想過逃避不去處理，但基本上整篇文章的思路是在感受到一股處身於「狹縫」中的壓力而「冒險奮進」地寫成的。「狹縫」的意念，是借助《天上人間》一書作者們的智慧（見龐熙榮等著《天上人間》，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頁9）；而「冒險奮進」一詞，則取材自林瑞琪於本期《思》之文章 九十年代中國宗教自由度問題初探（見「突破鎮懾自能享有自由」一段），特此向上述作者致萬二分感謝。

〔附經文分享：筆者於1995年3月一次講道所引用的「經文」，靈感取材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91年之《「百年」通諭》及Leonardo Boff & Clodovis Boff, *Introducing Liberation Theology* (Tunbridge Wells, Kent: Burns & Oates, 1987), pp.93-95, “The Dream of Truly Free Society”：

「上主說：我的百姓在香港和中國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極權主義、無神主義之手，領他們……建立一個滿有真理、公義、自由、和平、仁愛、喜樂的社會……阿們。」《新出谷記》〕

——草於薩爾瓦多大主教羅米奧殉道十五週年前夕

對抗「統戰」的「新戰線」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劉子睿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助理聖品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十八年多了，可不算是一段短的日子！意想不到當年在《思》第37期（1995年5月）所寫的一篇文章，〈在狹窄縫中冒險奮進的信徒群體：中國宗教政策陰影下香港教會出路的反思〉，現在翻讀，對照2013年自己所認識的香港情況，心底裡更加覺得沉重！

「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敢說是面目全非，卻已經是千瘡百孔。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經過了三朝，「一蟹不如一蟹」，民怨沸騰，直接導致七一大遊行及其他抗爭浪潮，而教會（筆者特別要指出是有體制組織的教會）卻越趨避世，或者更加有一種被「河蟹」的心態！當然會有教會領袖反對這種觀點，但筆者早在三十多年前，遠在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已先，便提出教會要留心統戰的問題，一直都沒有改變立場！

留心教會被統戰這觀點，筆者絕對不會承認是子虛烏有的想法，而是從歷史中汲取了慘痛教訓所得的結論！無論中國共產黨政權表面上說得如何漂亮，骨子裡這個無神論思想主導的政權，它的宗教政策依然是以統戰為目的，所以對宗教的態度，到最後還是要操控和管制，真正的宗教自由實質上是和這大原則相衝突的，又怎會落實執行呢？

比較《思》第三十七期筆者的文章，相隔了十八年再一次細閱，筆者深深覺得教會目前的形勢，更加險峻！十八年前，筆者用了「不甚樂觀」的字眼，今天可能要用「相當悲觀」才足以表達筆者的擔憂！不過在悲觀之餘，筆者在近幾年發現了一個現象，仍然令自己感到香港的信徒群體，並不全然是被「官方」思想所盲目地引導或「河蟹」，那便是有體制組織以外的「非官方」群體，不斷地在發聲，成為一股新的民間力量，特別在社交網絡上，這些聲音給我非常有力的鼓勵與支持！

因此筆者又會轉念想到表面上教會好像不發聲，被統戰或「河蟹」了，但另一方向肯定有一群信徒，堅決地拒絕跟從「官方」主流聲音，繼續以民間或半地下的姿態去發聲，令整幅圖畫又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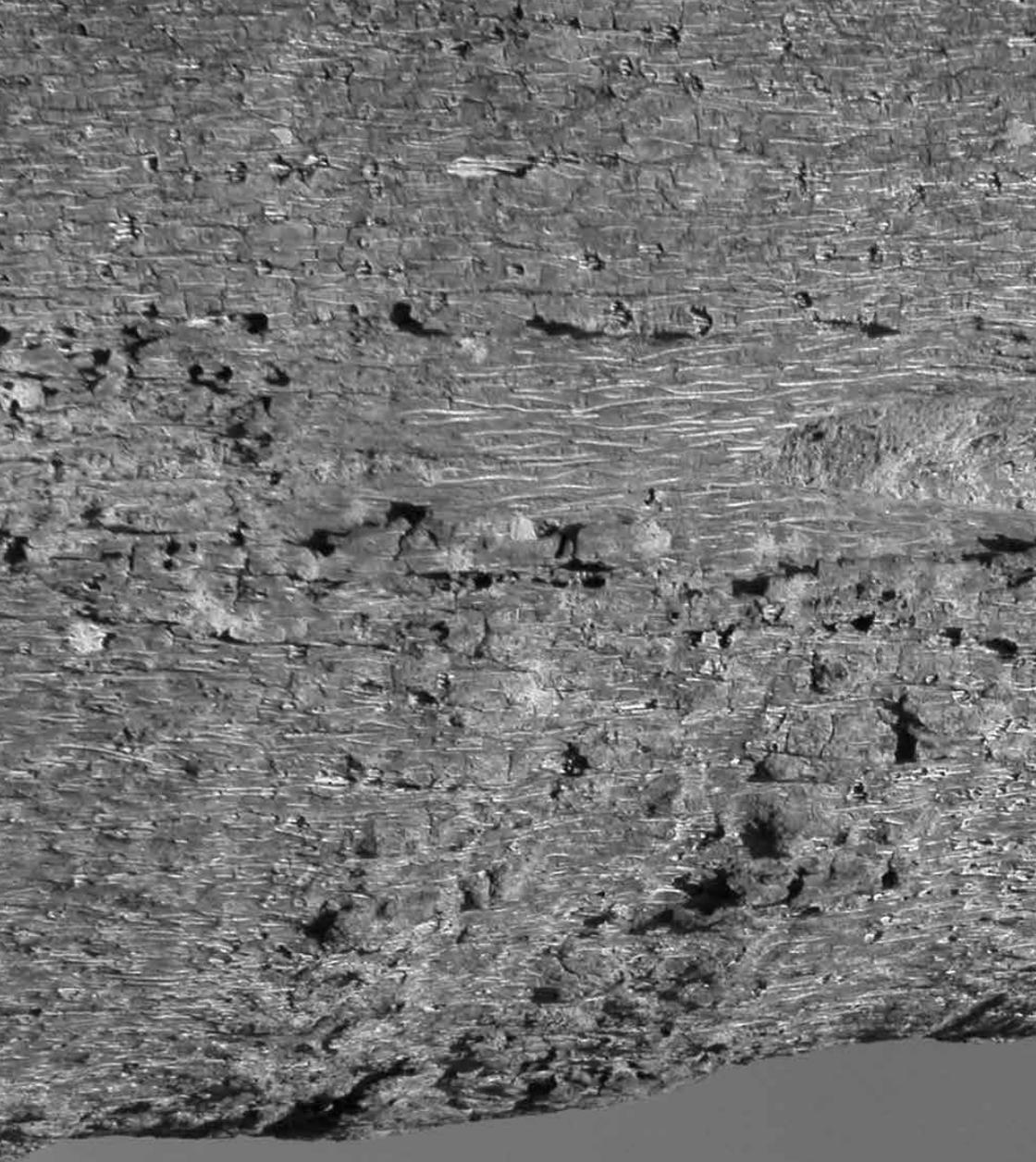
從歷史的角度去反思，科技的發明某程度上對思想傳播（正面或負面）有極大的影響，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背後，受到十五世紀西歐活版印刷術的幫助，改革思想得以迅速傳播。今天教會表面上充斥被「河蟹」的氣氛，但在網路上卻又有一群「鍵盤戰士」在默默地推動新的改革，反對被洗腦，抗拒被統戰，這一場硬仗誰也不敢說結果會如何！

由於網絡上的訊息，相對地不容易被封殺，因此筆者雖然對教會的前景抱悲觀的態度，但又藉這些「戰友」（有些甚至是素未謀面）的互相提醒和彼此討論，重燃一點希望！一條難以量度的新戰線已經慢慢形成，國家龐大的統戰機器雖然霸道，面對這條網路上的「新戰線」，或許也會感到頭痛吧！

無論怎樣，筆者仍然希望香港教會可以在二十一世紀經歷覺醒，讓自己借用十八年前文章裡的句子作結：「今天的香港教會栽種些什麼，明天便要預期我們將會收割些什麼；我們今天的抉擇，都不能逃避將來歷史的審判！」



為回應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於2月7日華人基督教聯合會舉辦的「為香港求平安」的言論，回歸基督精神關注及宗教霸權關注行動發起「反對宗教護照權運動」（簡稱反宗蔭權），(2010.4)，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宗教右派

| 羅永生

2010年

宗教右派所策動的這些新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比起西方世界這幾十年來日漸疲乏的左翼社會運動，有更清晰的運動目標和政治目的。而比起在議會和政治建制（例如政黨）中活動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宗教右派更能在日常生活和社區組織的層面鼓動民眾。宗教右派之所以能夠有強大活力，乃在於他們不將自己圍限在平凡乏味的議會政治規則和律法框框，反而更傾向以某種民粹主義和煽情反智的方式謀取支持。

2013年

香港社會的對立與不安的氣氛，在過去幾年急速擴散，而潛伏在文化保守主義背後，醞釀了超過十年的政治保守主義終於全面出場。三年前筆者希望透過批判、分析和觀察帶起起碼的關注和警覺。三年之後，文章所指涉的潛在趨勢已很快地成為公然地在進行、人人可見的事實。無論教內教外，「基右」現象都已進入公共廣泛關注的範圍。信仰與社會，也到了一個關鍵的考驗時候。

作為保守主義社會運動的宗教右派

思 · 115期 | 2010年4月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平信徒或神學家多會從信仰內容、教派分歧和神學思想的脈絡討論「宗教右派」，但其實所謂宗教右派，首要地是一個社會文化現象，它在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是一個被廣泛研究的題材。雖然宗教右派的確和基督教內某些福音派及靈恩派的信仰內容、教義詮釋方式有關，但外顯出來的，卻是一個影響廣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運動。

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西方世界曾經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戰後維持社會穩定的福利國家體制，被石油危機所震動而開始解體。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等，猛烈地衝擊著資本主義的文化和社會體制。可是，這股主要由青年人帶動的文化反叛浪潮，在七十年代末期，卻開始遭遇「新保守主義」的強力反彈。這場新保守主義運動，試圖在舊的保守主義基督教教義當中，吸取某些元素，以新的形式和姿態與資本主義重新結盟，充當挽救資本主義危機的文化後盾。

新保守主義者迴避對資本主義的徹底批判，卻將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責任，歸咎於社會價值的轉變，例如父權家庭權威衰落、個性解放、人權意識上升、女權主義興起，和對性的態度日趨開放等。新保守主義者的目的，是將社會體制廣泛存在的危機感，從一種可以促進進一步社會改革的左翼動力，轉化及收編為一種保守的右翼動力。他們從過去保守退縮的基督教基要派教義中，抽取了部分信條，卻得出在政治上和基要派不沾政治原則完全相反的激進結論，推動美國的右派的政治勢力，以政治的方式推動一場新保守主義運動。

新保守主義者從左翼的社會運動對手中習取了社會運動的方式，也有效地利用了社會危機處處的恐慌情緒，卻將危機和不滿視為當代社會和文化制度將會崩潰的徵兆，並將資本主義產生的異化意識及疏離失落，廣泛歸咎於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日漸減退。美國正遠離（他們心目中的）基督教立國精神，例如，他們不滿意學校只教達爾文的演化論而不教授「神創論」，公立學校不要學生祈禱，媒體上存在大量挑戰傳統家庭價值、鼓勵性開放及同情同性戀的信息；而政府政策也日益對女性有選擇墮胎的權利更為寬容。整體來說，他們將進步主義改革看成是文化危機，而更認為危機的根源是「世俗化」趨勢，把宗教信仰變成只是私人選擇。

當共和黨在這種保守主義的宗教力量身上，找到了反擊六十年代左翼進步主義改革運動的同盟軍之後，右翼政治力量 和這股新的宗教力量就開始互相勾結，變成所謂「宗教右派」或「基督教右派」。於是，互相矛盾的「政／教」組合就出現了：一方面是保守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 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這種組合就是所謂「新右派」。

換句話說，「宗教右派」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文化現象，政治權力是其核心，宗教只是這場運動的載體，提供精神動力及組織資源。區分這種主次關係是重要的，因為基督教教義並不必然自動引申出文化保守主義，相反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需要，把豐富的信仰內容，壓縮為一種意識形態。保守政治運動要從宗教抽取的，其實只是一種政治上有用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對聖經教義其實只是選擇性的緊隨字義(selective literalism)，而為了和其他保守主義力量結盟，他們甚至可以策略性地把某些教義和信仰原則束諸高閣。¹

新保守主義運動的目的是重整文化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原本在現代自由社會下被劃分開來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被重新混同，不單公共權力在挽救道德危機的大旗下被宗教右派大力利用來規管社會的德性培養、調控公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使得公共權力和公共機構日益沾染宗教色彩。在宗教右派大力鼓動下，性、身體和生活方式這些領域，漸次納入了政治規訓和管理的範圍。墮胎、安樂死、死刑、同性戀、婚前性行為、濫藥等，也成為 公權力介入私人生活領域的切入點。反對學校教授進化論，要求法院展示宗教象徵物等，也一一成為宗教右派燃點的政治角力的焦點。

所以，宗教右派是一種全方位地開展的右翼社會運動，目標是使宗教和政治的界線含糊化。雖然最終目標，即所謂建立一個依上帝旨意所管轄的國度（神權政治）未必受所有宗教右派一致同意，但務求在公共政治儀式滲進宗教象徵，在公共空間擴大宗教影響力，和在宗教儀式及宗教空間中展現、論述，甚至推動某些政治議程，則只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兩種不同面向。

宗教右派所策動的這些新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比起西方世界這幾十年來日漸疲乏的左翼社會運動，有更清晰的運動目標和政治目的。而比起在議會和政治建制（例如政黨）中活動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宗教右派更能在日常生活和社區組織的層面鼓動民眾。宗教右派之所以能夠有強大活力，乃在於他們不將自己囿限在平凡乏味的議會政治規則和律法框框，反而更傾向以某種民粹主義和煽情反智的方式謀取支持。

宗教右派以宗教熱情動員信眾投入政治，卻不會像自由主義者一樣恪守理性辯論及透過協商尋求共識，因為他們抱有強烈的敵我區分意識和文化戰爭心態。不過，亦因為這種戰爭心態，讓宗教右派顯現出一種對理性的犬儒態度，這種犬儒乃源自他們認為理性只是一種自由主義者所運用的武器。他們訴諸詭辯，因為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卻並非有誠意透過討論而求共識。從這個角度看，宗教右派實是一種在宗教面具下的犬儒主義者。

香港近幾年出現了宗教右派積極活動的現象。最多人留意的當然是個別團體（例如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等）在一些性、道德、家庭和生活方式等議題上大量動員教友參加一些施加政治壓力的社運活動。但最近，宗教右派活動的發展，實在超越了推動個別社會道德議題的範圍。例如，在立法會選舉中，某些教會的牧職人員，集中支持一些抱持右翼保守立場的親建制候選人，為其拉票。這種將宗教背景作為政治動員因素的趨勢，也可以在一些民主派政黨內部，個別議員積極支持和呼應宗教右派的政策取向中可見。

不過，由於香港的政治並非主要透過民主選舉進行，政治權力並不是主要由選票去分配，所以，宗教右派政治亦無需像美國一樣，以選舉的動員和選民的支持來標示。相反，一些選舉以外的政教互動，更能顯示保守或建制政治勢力和保守主義基督教之間的相互靠攏。例如，2007年在蘇錦樑出任高官之前，當時身為民建聯副主席的他，就在恩福堂參加了一個名為「主力愛家庭」的會議，同場演講的還有濃厚親中商人背景的容永棋、活躍在親中商界的教會長老陳世強，以及恩福堂的牧師蘇穎智等，而民建聯主席曾鈺成當時亦有上台發言，鼓勵與會基督徒日後就家庭和諧的議題多多表達意見，以制衡其他小眾聲音。



八十年代基本法草擬期間，支持民主運動的基督徒論政團體守望社，曾經就基本法內如何規限教會及教徒的參政權利，與親北京的聲音進行過筆戰。當年因為忌諱基督徒間普遍存在的批評建制取向，北京努力約束教徒及教會的參政空間，高舉政教分離原則，警告基督徒不得利用教堂宣揚政見及作政治動員。當時化名辛維思的親中寫手後來被證實是馬力。當二十多年後曾鈺成在恩福堂發言呼籲教徒起來時，馬力正是民建聯的主席。可見，親北京的建制力量與基督教的關係，在這些宗教右派的壯大底下，態度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故此，恩福堂這次會議，實可看為香港宗教力量和親建制右派政治相互靠近的一個歷史里程碑。

事實上，香港政府建制正由一批保守的基督教右派所穿透，乃一日益明顯的事實。退任高官馬時亨的妻子主力代理美國宗教右派相關組織在香港辦大型祈禱活動，基督徒高官代表政府接受祈禱祝福，這類活動屢獲政府以不同名目的財政支持，顯示基督教右派的跨國聯繫正在實現。諸如基督教《國度復興報》不斷鼓吹文化戰爭，鼓吹教會擁抱中國現政權，以及鼓吹香港基督教仿效美國宗教右派宗師Jerry Falwell成立類似Moral Majority的組織及政團，處處都顯示美國宗教右派既能發揮其自身直接的跨國的影響力，其理念亦不斷被本土保守建制派積極挪用，為香港打造一股強力的新保守主義。

1. 例如最近家暴條例爭議，明明是宗教團體把信徒動員出來，但他們卻被指示，不要以信仰教義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甚至要隱藏自己的信徒身份。這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但在政治策略的考慮下，矛盾的做法也好像合理。

全面出場的宗教右派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三年前，筆者在《思》發表一篇題為〈作為保守主義社會運動的宗教右派〉，希望憑藉一些粗淺的觀察和研究，警醒讀者留意「宗教右派」這樣一個新的文化政治現象。回想當日大膽把這個議題拋出，其實是有點戰戰兢兢的。一來是課題尖銳，二來是筆者的認識畢竟有限。面對一個堂會林立，宗派眾多，非常分散的基督教新教領域，如何能概括地勾勒出一種宏觀趨勢，不拘泥於神學教義之間的爭論，又能把問題的廣泛社會意義點出，這是筆者下筆時面對的挑戰。

回想過去十年，基督教當中部分組織對色情、道德及同性戀的議題，經常引起爭論。他們以基督教團體的名義，推動一種以守衛「道德文化」為內容的社會運動。對於這種文化保守主義，當然招徠文化上的開放派和非教徒的自由主義者反駁。他們要大力壓抑同志權益和同志運動，同志社群也會起來作相應的抗衡。香港社會一直有多元開放的傳統，對不同文化價值的存在和競爭，大都視之為個別人士在文化及信仰上所產生的衝突。基督徒佔人口總數不少，性小眾也只是一個少數派，所以大部分人看這兩個群體的衝突和爭論，不多不少都帶有隔岸觀火的心態。

可是，以筆者對當代世界文化趨勢與社會政治關係的認識，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因為從歷史可見不少例子，文化保守主義往往就是政治保守主義的帶路先鋒，而以宗教右派出現的保守主義運動，也乘著晚近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以新的形式在世界不同地方，產生令人憂慮的文化政治變化。這些影響都不只是個人的道德價值選擇，或者只影響到不同社群所喜好的生活方式，而是一個內涵非常複雜，對所有人都有深遠影響的整體文化變動。把文化保守與政治保守看成互不相干的事是十分危險的。

三年以來，香港的保守主義社會運動可說全速前進，保守宗教力量，特別是「基右」陣營在當中又更扮演顯著的角色。他們再不是一兩個保守的文化團體，為性議題和家庭價值做宣傳和研究，更是一些龍頭教會的領袖，以聖經的名義為順服政權說項，引經據典地舞弄教義，目的是為打壓社會的抗議聲音做勢。這幾年來，基右陣營所推薦的從政人物，走進政府高層，也參與立法議會選舉。他們在政府總部組成祈禱小組，不避政教難分之嫌，在媒體上公然聲稱在制訂政策過程中尋求上帝

指引。而部分基督教媒體也吹捧他們，褒揚他們在政府高層實現了所謂「基督教價值」。

另一方面，以前只是由堂會外的幾個小組去帶動文化保守主義，今天，一些基右取向的教會領袖則更公然鼓動和串連擁護建制的「反社會運動」，明顯地打出「政治保守主義」的旗幟，要求制裁試圖以行動挑戰政權的教牧人士和信徒。在這些領袖底下，部分信眾也積極地組成勇猛精兵，參與「文化戰爭」。他們在反同志權益運動上，動員能力史無前例。當中一些活躍分子，在「反同」動員過後不久，旋即又以「家長」或「市民」的名義，以更激進姿態投入街頭示威活動，扮演建制維護者的角色。他們不再只是懂得低調地用投訴、簽名、開「記招」、去立法會聽證會發言的方式來介入政策和政治，更會用臉書(facebook) 建立群組，組織街頭行動等，與其他社會上新興的右翼保守主義力量相互混同的機動方式，去推展一種有利建制派和保守勢力在香港「維穩」的工作。這些都是三年前沒有料到的發展。形勢在急速惡化當中。

香港社會的對立與不安的氣氛，在過去幾年急速擴散，而潛伏在文化保守主義背後，醞釀了超過十年的政治保守主義終於全面出場。三年前筆者希望透過批判、分析和觀察帶起起碼的關注和警覺。三年之後，文章所指涉的潛在趨勢已很快地成為公然地在進行、人人可見的事實。無論教內教外，「基右」現象都已進入公共廣泛關注的範圍。信仰與社會，也到了一個關鍵的考驗時候。



學會與dirtypress聯合出版《宗教右派》，
結集多位學者及組織者的討論成書 (2010.10)



性傾向歧視立法

| 胡露茜

2010年

隨著普遍社會對性的開放，加上女性主義及同志運動展現的人類情慾多元化的面貌，已經有愈來愈多人肯定兩性平等和性權選擇與實踐的多元文化；這些發展對傳統教會強調以法律強制公眾接受一種價值觀的取向，必然產生恐懼和焦慮。然而，教會除了繼續故步自封，並以維護異性戀婚姻和完整家庭的使命作為反對政府推行消除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理據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先放下以異性戀傾向為尊的心態，嘗試反省如何接待這群與我們不一樣的弟兄姊妹，並從他們身上尋找上主的新的形像？

2013年

過去半世紀，神學界中最引起教會震盪和不安的，就是以開拓和建構多元性／別與情欲空間的酷兒神學。它主要關注的是讓性／別殊異族群的悲壯歷史重新被聆聽和被看見，提出性權乃人權的一種，認識性／別的多樣化和流動性、超越和顛覆異性／同性、男／女等的二分歸類，走出單一的、固定的身分認同，打開身體性別曖昧混雜的神聖空間和可塑性。

同志身上的基督

思 · 93期 | 2005年1月

胡露茜
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

思

面對面的相遇

佇立高牆星滿天

我對同性戀平權議題的關心始於1998年。當時香港政府諮詢公眾對修改有關同性戀法例應否非刑事化的意見，我以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女協）主席的身分，跟一些關心此法例的基督徒團體就有關諮詢文件進行交流與反省，結果我們認為基督徒不應單以傳統教會視同性戀為罪和不道德等理由，繼續支持一條侵犯人權的法例。況且，當時在普世神學界和教會的思潮上，亦出現了不少新的觀點，是為同性戀持更寬容甚至肯定的態度。因此我們便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表示支持政府修改同性戀刑事化的法案。然而，這次參與只限於法例層面的關注，對社會上受歧視的同性戀者表達基督徒的關心和支持，我與同性戀者之間卻未曾有過任何真正的接觸。

及至1991年，我擔任中大崇基學院助理校牧時，一次我邀請了當時十分一會宗教組幾位代表，出席崇基學生宿舍的夜話活動。他們分享了在基督徒與同志兩種身分之間的衝突和掙扎。記得當時有兩件事情令我感到不安和震撼的，第一是當晚有幾位手上拿著聖經的同學，不斷環繞幾段有關同性性行為的經文對分享者提出質詢，並多番強調根據聖經的權威，同性戀是絕對違反上主創造人的旨意，並且是嚴重的罪行。然而，最令我不安的是，他們對十分一會朋友的真誠分享卻好像完全充耳不聞。

第二件事情是經過這次與同志信徒的面對面相遇，我不但以旁觀者的身分聆聽他們心底的聲音和信仰經歷，更被他們充滿傷痕、掙扎和勇氣的故事所觸動。我開始意識到，我與他們之間再不是一種強者對弱者的同情與關懷，而是從他們身上重新領受到一種新的屬靈力量，透過他們的見證，我對上主和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了解和體會。自此，這種力量繼續驅使我與本土的同志平權運動和同志神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與同志面對面的相遇，令我更深刻體會一種發自內省的神學反思：首先要開放自己，與具體的生命經驗相遇、對話，從而觸動我們重新反省自己的信仰，並對教會以至社會的傳統規範和教條進行認真的審視、批判、分析和修正，這樣我們才可以

令基督教所傳的福音更貼近人的真實處境和需要。以下我會嘗試介紹當代同志神學¹所提出的兩點與傳統神學迥異的另類觀點，包括對聖經權威、性的差異與平等的重新思考。希望這把異聲有助教會在面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衝擊時，仍願意敞開心懷，透過與同志信徒面對面的相遇，讓上主的靈釋放我們長期被禁錮的身體和心靈。

聖經權威的複雜性

基督宗教對同性戀否定的立場由來已久。第一世紀的猶太學者斐羅 (Philo of Alexandria) 及約瑟夫 (Flavius Josephus) 首先引用創世記第十九章的「所多瑪與俄摩拉的故事」，來抨擊男同性性行為。直至公元三至五世紀，教父時代的神學權威繼承了猶太教及第一代基督信徒反同性戀傳統，將當時創世記十九章中所多瑪和俄摩拉的毀滅，解讀成上主對同性性行為罪行的懲治。從此，這個雙城故事便成為教會譴責同性戀罪行的權威例證²。然而，這種解釋是否代表聖經原作者的意思？我們是否忽略了經文寫作時的處境及歷史因素？此外，我們亦要注意在流傳的過程中，歷代教會及信徒對聖經的解釋均按著不同的時代處境和傳統去詮釋，許多時候，不同的群體對同一段經文也有不同的解釋。

今天同志神學所面對最大的難題，一如婦女神學及其他第三世界神學的經驗相同，是教會所高舉的聖經權威的絕對性。可是，我認為聖經權威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聖經的文字本身，而是關乎聖經如何被詮釋以及誰有權去詮釋的問題。經過數十年聖經詮釋學所累積的智慧，所有詮釋學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運作，而聖經的詮釋也不例外。

綜觀聖經詮釋的歷史，從初期教會以來聖經詮釋方法不斷經過改變和修正。歷史中詮釋法的爭論，代表著不同群體的權力抗衡和爭奪——因此不少婦女和同志神學家曾經質疑所謂「正統」和「異端」的分別，只是反映教會歷史上誰勝誰負的結果，因此婦女和同志神學特別提出在過去聖經詮釋的過程中，由於傳統釋經偏重了男性和異性戀的經驗，因此婦女和同志信徒的經驗一直被置於教會的邊緣，成為沈默的

一群。雖然他們同是教會的肢體，但卻喪失了自己解釋聖經和發言的權利，而他們的經驗更往往被主流的偏見所曲解，甚至傷害。³

同志神學的出現可說是同志信徒在信仰上的一種逾越，今天他們除了採用近代聖經詮釋學的觀點，對傳統教會以「字面釋經」的方法來定義上主對同性戀的懲罰提出質疑，並提出同性性行為並不是當時聖經作者的主要關注。此外，聖經中有關同性戀的章節至今仍未有明確的定論，或因對某些詞語解釋不確定、或因修辭上的含糊、又或因時代不同故對同性戀的理解有出入，以致對聖經個別章節的詮釋出現分歧，因此，我們斷不可根據幾段經文的片面解釋而達至絕對禁止同性戀的結論。⁴

最後，同志神學認為耶穌所傳的天國的福音才是整部新舊約聖經的核心價值，而一直處於社會和教會弱勢的同志信徒，從耶穌基督身上所體會的，絕不是一個道德主義的護航者，而是一個願意謙卑降世成為貧窮人，與妓女和稅吏親近，並譴責那些假冒為善的祭司、律法師和法利賽人，因此他們相信同志基督徒應該勇敢地以上主子民的身分重新爭取自己對聖經和信仰的解釋權，目的不但是希望重拾同志作為人的尊嚴，也是他們真誠見證福音的表現。

性的差異與平等

許多持反同性戀立場的基督徒常引述保羅在羅馬書一章26至27節作為教會反對同性戀的基礎，認為同性戀違反自然，有違上主創造男女，成就生育的目的。在教父時期，更強調一切不為生育的性關係均違反自然，因此自瀆、與不育妻子交合、同性戀等均屬不自然。然而，同志神學卻質疑這種有違自然的性倫理標準，只是反映教會內以男性及異性戀為中心的偏見。

聖經時代的婚姻並不是兩性戀愛的結合，而是一種交易，女人則是男性擁有的財產。而人們對性的關切主要集中在生育的功能。因此假如今天教會要高舉聖經的權威和自然定律的絕對性，我們是否遵守「生養眾多，遍滿全地」的命令？這是否又是上主對今日人類的美好心意？此外，耶穌亦曾對選擇不結婚生育的人予以肯定

（太十九：11-17）。因此，單以「無法生育」為理由譴責同性戀是站不住腳的。不少神學家亦提出男女婚姻是理想的關係模式，但這並不表示要禁止其他性愛方式。從信仰的角度，更應強調以愛和公義為基礎的親密關係，而不是只看進行性行為者是同性或異性。

今日，隨著普遍社會對性的開放，加上女性主義及同志運動展現的人類情慾多元化的面貌，已經有愈來愈多人肯定兩性平等和性權選擇與實踐的多元文化；因此，選擇在異性戀婚姻以外的性態生活，如同性戀、雙性戀或單身等都是個人情慾自主的實踐。這些發展對傳統教會強調以法律強制公眾接受一種價值觀的取向，必然產生恐懼和焦慮。然而，以宣揚基督的公義和合一的教會，除了繼續故步自封，拒絕聆聽不同性向人士在日常生活所遭受到的歧視，並以維護異性戀婚姻和完整家庭的使命作為反對政府推行消除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理據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先放下以異性戀傾向為尊的心態，嘗試反省如何接待這群與我們不一樣的弟兄姊妹，並從他們身上尋找上主的新的形像？

美國聖公會的牧師和神學家卡蒂希活（Carter Heyward），本身亦是一位女同性戀者。她指出傳統基督教將性等同罪、靈等同上主的二元對立的神學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以後基督教在性倫理的發展，而這種靈／慾截然二分及對非異性戀者的排斥的神學主要源自教父時代的詮譯，並不是基督教唯一或絕對的標準。卡蒂建議今天的教會應勇敢地糾正以異性戀為尊的信仰詮釋，重新認識和肯定人性及人在性和情慾方面的多元表達和發展的權利。此外，教會的道德力量不是建基於一種對別人的控制和規範上，而是與我們不一樣的鄰舍相遇，建立平等相互的關係，從而增加彼此的認識和團結。⁵

現代法律的理想，是既要公平，又要正確。然而，每一個人對何謂正確的理解都會不同，所以現代法律本身只可盡量以公平為原則，讓不同的人在平等和尊重多元差異的原則下相互共存。⁶

從基督徒的角度反省，將性的宗教性簡單地約化為一種劃一的道德標準，並將其他

持不同經驗和意見的信徒界定為反基督教，是過分片面和狹隘的做法，我相信教會不同社會議題上的參與是一種靈性上的掙扎，因此應以謙卑的態度重新在鄰舍的身上認識陌生的基督，而不是要君臨天下，聲稱唯有我才擁有真理的狂妄自大。

因為只有當我們開放自己，接待那些我們不認識，甚至感到厭惡的陌生人，我們才可以發現基督在他們身上的奇妙作為。讓我們重新認識同志身上的基督吧！

注釋

1. 此文介紹的同志神學主要指那些專以探討和研究異性戀世界以外的不同性向群體的信仰和神學著作，當中部分是以同志身分發言的神學家和釋經學者，包括 Carter Hayward, Beverly Wilding Harrison及Mary Hunt等。
2. 見Jeremiah: 雙城記：錯置的罪名，《暗夜中的燈塔》（台北：同志同光長老教會，2001），頁127-136。
3. 提出這些觀點的學者主要包括Elizabeth Schussler-Fiorenza, Sharon H. Ringe及Rita Nakashima Brock等。
4. 提出有關的同志神學和釋經論點的學者包括Lisa Sowle Cahill及John McNill等。
5. Carter Hayward, The Redemption of God-A Theology of Mutual Rel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頁107-138。
6. 吳國偉 基督信仰與現代社會寬容性，《時代論壇》，第703期，2001年1月28日。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舉辦「異中求同——教會回應性傾向歧視立法」公開交流會 (2013.3.25)

圖片來源：時代論壇

超越恐同及性／別二元的 基督信仰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 胡露茜

神學教育工作者

恐同的根源問題是關乎人性的問題

恐同的根源問題是人性所共同面對的問題，所以我不認為恐同只會出現在那些保守衛道之士的身上。這問題就是當人在缺乏安全感，或處於非確定性的狀態下，便會產生恐懼，而其中一種處理或逃避恐懼的方法就是向外尋找一些權威性的依據，使自己心有所安。

這些權威性的依據在宗教層面會被提升為絕對的真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種以真理之名所宣講及行使的宗教主張，不但對信者具權威性，更可以演化成對異己／異教的排斥、甚至迫害，這些悲劇在人類及宗教的歷史上不斷重演。

基督宗教為何恐同？

基督宗教對性少數(包括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以及雙性人等)的偏見和排斥與恐懼或厭惡，是內在結構於男尊女卑的性別二元系統的文化思維。同性戀／性少數之所以被視為「變態」並引發社會恐慌，因為它直接挑戰並顛覆了異性戀婚姻制度的絕對性，拒絕二元性別刻板規範的侷限。談起性別，一般人都會認定每個人天生就是非男即女，所謂第三性總會令人覺得不自然，甚至嘔心，這是因為社會已為性別建構起一些規則，限制我們想像、談論、以及理解性／別的方式。

開拓多元性／別及情慾空間的酷兒神學

過去半世紀，神學界中最引起教會震盪和不安的，就是以開拓和建構多元性／別與情慾空間的酷兒神學。它主要關注的是讓性／別殊異族群的悲壯歷史重新被聆聽和被看見，提出性權乃人權的一種，認識性／別的多樣化和流動性、超越和顛覆異性／同性、男／女等的二分歸類，走出單一的、固定的身分認同，打開身體性別曖昧混雜的神聖空間和可塑性。

對於這些性少數的朋友，因為缺乏社會和教會的認同，以至連具體構成自己身分的物質基礎都被剝奪，例如面對廁所作為最明確標記隔離性別的公共空間，跨性別者





到底可以做的選擇是什麼？廁所的嚴格性別分野，使得無數跨性別者連執行他們生命中最尋常的例行身體活動都被迫面對別人的譏諷，甚至羞辱！

對於雙性戀者，當我們的社會長期習慣於將人擺放於定點而輕忽了過程，便會看不見人的性態不是固定、單向的，而是流動及有無窮的可塑性。雙性戀者如何讓主流社會和教會明白並接納雙性戀就是一種性的表達方式，雙性戀是忠於自己的本性，面對自我的一種欲望模式？

酷兒神學認為由於性少數的歷史是一個被罪(被不公義的文化和制度所排斥與壓迫)的歷史，這歷史不但令他們與那位甘願為公義和愛而自我倒空，並被十架酷刑所殘殺的耶穌相遇，亦使他們更真實地經歷基督的愛和公義所帶來的恩典及釋放的力量。因此，酷兒神學挑戰教會是否願意走出自以為是的道德高地，進入那些處於性底層的弟兄姊妹當中，重新認識和了解他們有血有肉的故事。

酷兒神學不但為同性戀者、跨性別者及雙性戀者服務，更為活在性及經濟剝削下的性工作者服務；它不但尊重健全人的性權，更為身體及智能障礙者的性權而發聲。酷兒神學相信基督的福音是為了普世人類的救贖，祂的愛和恩典是超越文化、種族、國界、階級、性／別、年齡、能力和性向等的分歧。耶穌基督所設立的聖餐的目的和意義不是將人分隔：基督徒／非基督徒、異性戀／性少數、男／女，並以自己的標準將人定罪，而是打破分隔，使人與人、人與神、人與上主所創造的一切得以復和及彼此相愛、團結。

最後，分享一段從電視節目 6 Billion Others 看到的，其中一個被訪者發人深省的故事，這故事的主題是「令我最快樂和滿足的時刻」：

「一個中年男子記述一晚在酒吧跟一位陌生人交談四個多小時，原先他相信人與人的距離，可以透過認識和明白對方的不同立場而拉近，但這次相遇的經驗卻改變了這想法，因為他跟這個人愈認識彼此的立場，就愈清楚大家的分別，雖然如此，他卻感到非常快樂和滿足，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心靈都因此而拉近了。最後，這個見證



的男人說，我是一個猶太人，他是一個巴勒斯坦人。」

南非杜圖主教曾經就種族隔離政策及同性戀的議題發表過以下的言論：「上主創造我們不是要求我們成為一式一樣的人，而是讓我們學習如何共同生活。(God creates us, not for sameness, but for togetherness.)

我更相信耶穌給我們的誠命，不是去征服異己，而是愛鄰如己。







還動物一個公道

| 張婉雯

2012年

動物議題與人類議題並不是對立的。動物的處境而是人類的寫照。在流浪動物絕跡社區的同時，舊區的小商戶要面對清拆重建的推土機；以紫田村與菜園村為家的，有人也有動物。只是，人類的戰場往往以動物為炮灰。

2013年

這幾年，動物權益運動，已由街頭餵飼貓狗，發展至對政策發表意見，推動文化教育，塑造新價值觀的層次。喜歡動物與否是很個人的事；但動物權益背後的精神，是普世價值，是在制度與文化的層面，讓弱勢群族得到出頭發聲的機會；他／她／牠們需要的，是機會、是尊重，而不單單只是援助與同情。

關懷動物從來是人類自救

思 · 126期 | 2012年8月

張婉雯
香港理工大學語文導師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2006年1月8日「反虐殺大遊行」，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一次的爭取動物權益遊行；自此，大大小小的動物權益運動此起彼落。香港的動物權益運動，這些年來到底取得甚麼成績，又有甚麼問題未解決呢？「反虐殺大遊行」已是六年前的事，經常有朋友問我：其實，你們改變過甚麼？

思索的結果，就是這篇文章。

先天不足：沒有民主

如同其他社運議題一樣，動物權益運動的致命傷是本港沒有民主政制，民意對施政沒有實際影響。這幾年，民間對動物權益的認識其實大為提高；最佳的例子，莫過於李嘉誠基金會“LOVE IDEAS”申請活動投票中，以非牟利獸醫診所的「流浪狗絕育放回」計劃獲最高票數一事。無線電視劇如「當狗愛上貓」、「老友狗狗」等以愛護動物為題材，2010至2012年，就記憶所及，亦有多次大型動物權益活動，分別為2010年5月2日「反漁護惡法，要救不要殺」大遊行，7月25日「725抗漁護」上水狗房集會、8月21日「重組漁護署」大遊行；2012年4月1日「爭取立法禁止熊膽製品入口」大遊行、5月6日「黃忍追悼會」，還有保護梅窩黃牛和抗議海洋公園奴役海豚等。這些活動都在網路上引起頗大迴響，也能吸引了數以百計的市民現身參加，主流傳媒也有報道跟進。然而，漁護署的動物政策並沒有太大改變；市民既無選票在手，官僚自然也沒有改變的動力。

漁護署定位錯誤

政策嚴重落伍的另一個原因，是漁護署定位錯誤。愈來愈多人知道：動物到了漁護署動物收容中心而無人認領，不出四日就要處死。義工與團體多年來爭取以「絕育放回」來取代現行的捕殺政策，亦已有九個區議會同意實行，但署方依然一拖再拖，理由是貓狗已被馴化，不能照顧自己，不能讓牠們在街上自生自滅。這種看法意味著「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與「動物權益」(animal right)之間的分歧。從「動物福利」角度來看，人類也許會以某些方法減輕動物的痛苦，但歸根究底動物的存在價值就是為人所利用；動物本身沒有權利可言。這和許多義工團體所持的「動物權益」看

法——動物不是工具，而自有其獨立於人類以為的生存權利——有所分別。

事實上，所謂「漁農自然護理署」這個部門名稱，亦意味著「漁業」、「農業」（亦即人類生計口糧）為重，「自然護理」頂多排行第三；而有幸獲漁護署「護理」者，亦只限於受保護動物。其實，隨著城市發展，「動物」這個概念亦一直演變。的確，在三、四十年前，社區並沒有「流浪動物」的說法，貓狗隨意在街上活動，沒有人會認為這是衛生問題或滋擾，而是視牠們為捕鼠看門之工具，甚或煲中美食。土地城市化割裂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社區動物」變為「流浪動物」，面對兩條路：一是成為「寵物」（因為署方認為貓狗「不能照顧自己」），一是成為「衛生滋擾」，必須讓牠們在社區消失。這種思維令社區動物問題走進死胡同：首先，不是每個人能夠或願意與動物同居一室；而漁護署一方面認為貓狗等動物必須得到領養，另一方面卻無開放領養渠道。其次，貓狗只是社區中最常見的動物，香港地卻還有野牛、野豬、猴子等種種野生動物。除了猴子、黃麂等獲列入受保護動物範圍外，牛、野豬等命運就只有「死路一條」，或遭署方拍賣成為「食材」，或被狩獵隊槍殺——難道我們能讓野牛野豬成為寵物嗎？

漁護署的定位到底是甚麼？2007年曾蔭權重整政治架構時，已有動物團體建議把漁護署歸入環境局，而非食物及衛生局——動物豈能只是「食物」和「衛生」問題？可惜到最後，一切仍以官方決定為依歸。只要市民翻查立法會資料，看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先生在會議上就動物議題僅有的回應，就知道他對動物議題是何等陌生與無知。在這樣的局長領導下，我們又怎能期望漁護署來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呢？

操控慾望澎湃

這幾年來，眼見市民對動物的看法有進步，但亦聽聞不少橫蠻無理的投訴例子。有義工對我說，她所住的屋苑有一對經常把孩子放進嬰兒車中的夫婦，老是向管理署投訴附近有流浪貓，因為他們擔心貓兒會跳進嬰兒車中——把幻想（或被迫害妄想）當成事實是可笑的；然而更可笑的是，政府部門的確會使用公帑把貓兒捉走處死，去應付這些從來沒發生過的事。

我經常提醒自己：把愛護動物人士和投訴流浪動物的市民對立，對改善動物處境毫無意義。那些認為貓兒會跳進嬰兒車的人，不過出於保護自己的孩子和產業（多為高尚蚊型住宅單位）的苦心，只是這苦心往往演變成操控環境的欲望。當我們的城市處處保安，空調恆溫；當我們習慣以膠樹代替真樹，以寵物代替動物時，還有甚麼是不能控制的呢？——《明報》頭條就刊登過市民投訴鳥聲騷擾睡眠的「新聞」，蛙鳴與棉絮飄揚也是不可容忍的。連大自然定律都遭投訴，不是新聞又是甚麼？

把「以人類利益優先」誤當成「以人類利益為唯一」的，也不只一般市民。2010年11月初立法會同時有「動物友善政策議案」和「釋放劉曉波議案」，只有前者獲得通過。部分議員即時借題發揮：「人權連貓狗都不如」，翌日亦有名主播作出同一比喻。動物權益和人權幾時變成對立？動物權益和人權，不也是出於對公義、仁愛的追求嗎？我們不可以支持釋放劉曉波之餘又對動物友善的嗎？

動物議題與人類議題並不是對立的。動物的處境而是人類的寫照。在流浪動物絕跡社區的同時，舊區的小商戶要面對清拆重建的推土機；以紫田村與菜園村為家的，有人也有動物。只是，人類的戰場往往以動物為炮灰。

動物團體與義工

大部分市民對動物團體的認識，僅止於「愛護動物協會」；然而，民間一直有許多小型團體和獨立義工，主要工作為暫托領養。

動物義工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大部分是女性。女性主義與動物權益、生態之間的關係在外國是熱門研究題目；我不是社會學學者，對這個議題認識不多，但根據個人觀察，我發現女性對弱小者的愛憐，的確讓她們對動物產生強烈同情。餵飼街貓野狗的，往往不是那些生活無憂的有閒階級，而是從自己僅有中掏出兩個銅錢的深水埗師奶和粉嶺老婆婆。她們也許把自己的經歷投射在流浪動物身上了，也許只是出於簡單的憐憫。由於動物沒有公共支援機制（例如公立獸醫、不處死動物的公立收容中心、公立領養服務等），義工的擔子實非常人可理解：每晚夜半餵飼；捉貓捉

狗做絕育手術或治病；自行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徵求暫托或領養家庭；騰出地方安置面臨危險的動物（遭人投訴、居住地遭清拆、受傷體弱），等等、等等。義工經常收到市民電話電郵，說是見到某處有動物待援，希望義工能幫忙。市民固然一片善心，但其實動物義工的資源並不比別人多；他們所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時間、金錢、精力和愛心，對抗一個手握權力與公共資源，而又專為投訴者服務的政府部門。所幸近年年輕人加入，協助這些不懂上網、不擅求援的婦人，把領養、暫托、籌集糧食或醫療費用等消息以網絡廣傳，讓這些教育水平不高的婦女得到或多或少的支援。

婦女對動物的照料既出於同情，則女性動物義工的工作以慈惠性質為主亦是理所當然。不過，近年義工也開始意識到：慈惠是必須的，但問題的根源始於社會文化與政策失誤。一方面，義工學會了向警察、議員求助，行使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遊行、請願、教育等活動日多，大眾開始明白動物義工並非「貓癡狗癡」，而一樣對社會有貢獻。

散佈各區的義工數量雖多，但本地尚未出現一個能與政府長期周旋（如環保界的綠色和平）的動物權益組織。當資源有限時，先處理眼前急切的拯救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也就犧牲了根治政策問題的長遠需要。我們需要一些全職的動物權益工作者，集中於倡議政策、教育工作之上。當然，要實現這個希望，必須得到市民在金錢與物資上的支持，然而若不開展教育，又如何令市民支持呢？此亦是兩難處境。

這些年，我們改變了甚麼？

其實，這些年來，我們改變了甚麼？

我想，最大的改變是我自己。我看到人性的狹隘，也看到自己的幽暗。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原來可以滿腔仇恨，然後，我告訴自己，我必須學會排遣這種仇恨，不然，我和我所恨惡的，沒有分別。

關懷動物從來是人類自救。

讓「失敗者」領我們到 迦南——談動物權益與 「佔領中環」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 張婉雯
香港理工大學語文導師

日前，好幾個動物團體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教授會面，商討「動物議題」與「佔中」的關係。

或許有人會問：咦，動物，跟佔中，跟民主，有何關係？

我想，那關係就是：動物權益，與和平佔中，其實都是民間重奪話語權的過程。

這幾年，動物權益運動，已由街頭餵飼貓狗，發展至對政策發表意見，推動文化教育，塑造新價值觀的層次。我們經常說：動物權益主義者，並不必然是寵物主人，甚至不一定很喜歡動物。喜歡動物與否是很個人的事；但動物權益背後的精神，是普世價值，是在制度與文化的層面，讓弱勢群族得到出頭發聲的機會；他／她／牠們需要的，是機會、是尊重，而不單單只是援助與同情。飼養動物是興趣；動物權益卻是公義的原則。而公義，包括對大自然，對動物的公義，其實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

佔中發起人說，佔中的目的，並非在於「佔領中環」這個動作本身，而是在於佔中行動對周遭的人（包括市民與既得利益者）所帶來的心靈上的改變、轉化。作為基督徒，我對這番話深有體會：動物的解放必須來自人類心靈的釋放。拋開對衛生的狹隘想法吧，拋開管理主義的威權吧，拋開對投訴的顧慮，拋開對動物的歧視，人類才會發現天空有多大，而大自然的懷抱一直向我們張開臂膀。從事動物權益運動多年，有一件事始終令我感到遺憾：像許多社運團體一樣，我們總予人憤怒、激烈、批判的感覺；但歸根究底我們想追求的，是讓人明白與動物相處的快樂，還有就是隨公義而來的平安與真正的和諧。

香港動物權益現時所處的僵局，其實也是整個香港社會的困境：一是官員的傲慢與偏聽，二是由此而來的民怨，再因民怨而造成的激憤，反過來撲向管治者，形成更大的矛盾與衝突。這些衝突僵化到一個地步，令社會再也容不下真正的討論與磋商，雙方只隔岸叫陣，各自發聲，卻沒有交流了解。理性的觀點往往需要足夠的篇幅來容納，也需要公眾花時間理解發言者的思路，但這些細緻功夫都被臉書上三言



兩語的情緒發洩所取代，耗時的思考也變成即時的Like與Unlike。有時我懷疑，動物權益界的某些名字（很可能包括本人）是否已被政府相關部門和某愛護動物組織列入了入「凡事必反」名單，舉凡一見到這些人名，便把相關的建議、意見打入冷宮，也不管這些建議是否合理。民間與管治者之間權力失衡，以致民間不得不以激烈的姿態爭取話語權，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對立與分裂。此時此景，「愛與和平」談何容易，卻又是唯一出路。

台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內容講述猶大之所以出賣耶穌，是因為他誤以為耶穌要搞革命；只要耶穌赴死，人民就會起義。從猶大的角度看，耶穌這樣「順攤」便走上十架，是個徹底的失敗者，正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史懷哲等等全是失敗者，他們在有生之年都沒有達到世人所認同的「成功標準」；他們的血淚是白流的。然而，歷史正因為這些人而微調著方向；一個個的失敗者，最終會帶領我們走向迦南。這是動物權益運動的目標，也是所有爭取自由公義的人的目標。



於政府總部外的「動物哭訴大會」，要求政府當局全面取締私人繁殖再銷售，近年市民醒覺爭取立法以保障動物的權益 (2012.11)

圖片來源：獨立媒體



香港社會的心靈面貌

| 黃麗彰

2002

我們的社會患了甚麼病？每日翻開報章、扭開電視，不住看到青少年自殺、母攜子尋死、父因欠債燒炭……等令人惋惜慨歎的新聞。筆者相信自殺問題嚴重，顯示出我們整個社會都病了，而且病入膏肓。我們的社會事物有悖常理，失去了安全感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焦慮中，整個城市的人都好像有種被困的感覺，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即使持守、堅持，問題仍會存在，在荒謬的困難背後，我們找不到自己相信的盼望。

2013年

特區政府給人的印象是官商勾結、政府高官以權謀私。梁特首大話連篇，不住用語言「偽術」來遮掩過錯，上樑不正下樑歪，我們的下一代好像也變得是非不分，學生為了得到好成績，不惜抄襲，老師同樣把學生的功課販賣，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似乎在瓦解中。究竟我們的社會應何去何從？坦白說，我的心感到非常悲觀和絕望，直至最近看了一齣港製電影《狂舞派》，它重新燃點我對這個城市的盼望。

我們的社會患了甚麼病

思·80期 | 2002年7月

| 黃麗彰

柴灣漫信會輔導中心主任

思

佇立高牆星滿天

我們的社會患了甚麼病？每日翻開報章、扭開電視，不住看到青少年自殺、母攜子尋死、父因欠債燒炭……等令人惋惜慨歎的新聞。一時間整個社會都在討論自殺的問題，政府勸喻市民逆境自強，民間組織叫人珍惜生命、關懷鄰舍，無數的求助熱線，鼓勵有困難的人尋求協助，不用自尋短見。人們對自殺的問題各有理解，有人歸咎自殺問題源自經濟難題，尤其對於很多中年男士來說，失業等同失去生命價值，再加上負債纍纍，更加沒有生存的動力。有人認為問題在於人倫關係薄弱，各家自掃門前雪，令遇到困難的人獨坐愁城，弄致問題愈來愈複雜；亦有人認為自殺是個人意志力薄弱，一遇上問題，便用自殺來逃避。姑勿論是甚麼原因，筆者相信自殺問題嚴重，顯示出我們整個社會都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我們的社會事物有悖常理

我們一向以為家是溫暖的象徵，不論外在世界有多少風風雨雨，有甚麼風霜雨露，只要回到家，便得到溫暖，便得到家人的支持。但一個個倫常慘劇，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原來家可以是一個危機滿佈的地方。子操刀弑父，夫兇殘地殺死妻兒，然後自盡，這豈不是有違常理的事件嗎？更加令人感到荒謬的是，一向被認為保護幼兒的父母，竟是殺害他們的兇手，教人怎樣理解這些荒謬的事情？局外人除了一聲歎氣之外，整件事情的荒謬性也帶給我們一定的衝擊。我記得上水一個婦人因丈夫在內地包二奶，狠心地把孩子由窗外拋下，繼而自盡，往後在同的小孩子不禁問他們的父母，「你也會這樣對我嗎？」在孩子的世界裡，容不下這些荒謬的事情，成年人又怎樣教導孩子面對人性的幽暗面？

失去了安全感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焦慮中

在一個穩定的社會，只要按常規辦事，勤勤力力，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在預計中發生，例如青年時訂下儲蓄計劃，年老時便可安享晚年。有誰料到，青年時辛苦賺取金錢，到中年卻成了負債；我們一向以為工作經驗與學歷是事業上晉升的必要條件，但如今轉換工作時，這些東西也會成為負資產。我們一向賴以建立安全感的東西，霎時間變相成為負累，我們還有甚麼可以依靠呢？香港一向是個經濟掛帥的地

方，只求能力，不講信仰，有一天當能力都不可靠時，我們還有甚麼？沒有信仰，失去依靠，連最基本的內在安全感也在崩潰。我聽過很多人與我分享他們每天清早上班的心路歷程，就是戰戰兢兢，內心充滿掛慮，甚至恐懼，結果陷入無止境的焦慮中。

整個城市的人都好像有種被困的感覺

有時人遇到困難，在處境中沒法找到出路，便需要尋找別的出路。但活在香港，由少年至成年都有種被困無法逃出生天的感覺。有些少年人不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父母老師甚至整個社會都在有意無意間向他們傳遞了若讀書不成便等同沒有前途的訊息，因此少年人因著考試失敗而結束生命。成年人想轉換工作崗位，但眼看整個社會都在資源增值，瘦身減肥而苦無出路，於是惟有以受苦的心情繼續目前的工作。家庭主婦把整個生命都投資在丈夫兒女上，當發現丈夫戀上別的女人，便陷入前路茫茫的景況中。在輔導室中，聽見無數的生命在呻吟，他們感到痛苦，但沒有出路，究竟這種被困的處境何時才能終結？

失去了盼望

我的爸爸曾經向我講述他一個經歷。約在四十年前，他游水偷渡到香港，游了一整天，沒有吃東西，已筋疲力竭，他想他快要溺斃了，就在昏睡前一刻，他看見遠處華燈閃閃，心想這必定是香港；他就憑這個盼望，重拾體力，以最後一口氣游到岸邊，果然給他偷渡成功。每逢聽他講述這個經歷，都讓我明白盼望的重要，為甚麼他能重拾體力再游下去？就是一線盼望帶來的動力，人在生死存活的一刻，需要盼望讓我們堅持下去，但這個年代的盼望是甚麼？我們一向接受的教導是只要有恆心，問題總會有迎刃而解的一天，於是遇到困難，我們憑毅力堅持下去。但一年又一年，問題依然存在，再以客觀理性分析，似乎問題難以有解決的一天。在這個時勢下，試問失業的中年男子，有多少可能尋獲一份與從前工資相若的工作？在高峰期間購入的樓宇，又有多少希望能回復在購買時的價格？在深圳包二奶生了孩子的丈夫，又會有回轉的一天嗎？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即使持守、堅持，問題仍會存



在，在荒謬的困難背後，我們找不到自己相信的盼望。

生存為了甚麼？

這是在苦難中一個終極而又必須回答的問題。究竟生存為了甚麼？很多在困難苦難中的人都曾經問過這個問題，但沒有人能夠給予他們一個心悅誠服的答案；縱然參考別人的經歷，也難找到一個切合自己的答案。其實，在眾多成功克服逆境的故事裡，都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就是他們已經跨過逆境，如今雨過天晴，回頭一望，分享自己作為過來人的體會，這些分享誠然寶貴，且帶給人鼓舞作用，令身陷逆境中的心也期望自己有雨過天晴的一天。情況有如化妝品廣告，鏡頭前是一個用了某牌子護膚品的美女，冰肌雪膚，效果令人羨慕。示範作用帶來一定的功效，但有多少例子是那些身陷逆境還未逃出生天的人真誠地分享他們的生命信念？在沒有依靠、沒有盼望的逆境中，最後的一道曙光是人對生命一份看不見、摸不到的信念，這亦是人為甚麼生存的答覆。

Victor Frankl在他《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中提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猶太集中營的遭遇。當一切都失去，連盼望也失去的時候，人需要意義讓自己存活下去。但可惜的是，一直沒有人認真地向我們解答存生意義的問題，或是向我們提供一個與我們實在的經歷拉上關係的生存意義，一個與實在經歷脫鉤的意義只會成為束之高閣的道理，是限於星期天崇拜時聽道時聽見的道理，當離開教會，大部分信徒豈不又要重新面對與生活搏鬥，卻又失去意義的困境嗎？

香港人一向是務實的群體，每每都以行動方法來解決問題，對於這等生命意義的討論，沒有多大興趣。最近連專上學院進行改革，以市場為導向，大學講師為求生存，紛紛舉辦受學生歡迎的課程。這些曲高和寡、沒有市場價值的討論課題，恐怕連一向講求理想、不吃人間煙火的大專學院都難有容納的空間。

總結

一個個自殺故事、倫常慘劇的背後，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病態，我們生活在一個只講

成功、高度競爭的社會，人倫關係崩潰，外在社會失去常理，人內心深處充滿焦慮恐懼。但更痛苦的是，這是人看不到終結的煎熬，究竟何時才柳暗花明？在看似沒有出路的逆境，我們除了需要一些面對逆境的招數外，更重要的是對生命課題的探討，究竟生命的意義何在？怎樣建立生命的信念？但這些曲高和寡、沒有市場價值的課題卻愈來愈少生存的空間，教會為了增加會眾人數而各出奇謀，例如增強講道的趣味性、加入流行音樂、講道戲劇化的原素。大學亦為求生存空間，舉辦愈來愈多受學生歡迎的課程，每年報讀哲理神學的學生，多是在別無他法下才作出這樣的選擇。我們的社會正面臨一個巨大的時代挑戰，面對愈大的時代挑戰，就更需要探索生命意義的課題。在這個病態的社會裡，讓我們齊心協力作出積極的回應。



曾蔭權政府管治失度，令社會充滿憤怒、焦慮和失望 (2012.3)

圖片來源：太陽日報

給我們的城市一份盼望

思 · 132期 | 2014年4月

| 黃麗彰

清泉輔導室資深輔導員及督導



佇立高牆星滿天

最近與友人吃飯，談到香港的情況，他說了一句很有反省的話，他認為英國人統治了香港差不多一百年，幫助這裡的中國人去除了很多陋習，例如在公共地方要講衛生、要守秩序，競爭必須公平公正，社會可以容納不同聲音，所以要有言論自由等等。

朋友的一番話，令我感觸良多，我很回味過去的香港，縱然也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整體來說，那時的社會是有活力的，也是較健康的。反觀今天回歸後的社會，不但是政權回歸，而且也是中國人陋習的回歸；特區政府已不像從前那樣廉潔公正，反之給人的印象是官商勾結、政府高官以權謀私。再不用說梁特首了，他大話連篇，不住用語言「偽術」來遮掩過錯，上樑不正下樑歪，我們的下一代好像也變得是非不分，指鹿為馬，學生為了得到好成績，不惜抄襲，老師同樣把學生的功課販賣，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似乎在瓦解中。究竟我們的社會應何去何從？坦白說，我的心感到非常悲觀和絕望，直至最近看了一齣港製電影《狂舞派》，它重新燃點我對這個城市的盼望。

這是一齣充滿青春活力的影片，故事講及一群熱愛hip hop的大專生，如何在重重逆境中掙扎求存，甚至有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跳舞是他們的志趣，亦是他們的夢想，相較拿好成績，跳舞在現實中沒有什麼物質上的回報，然而他們熱愛跳舞，一心一意地把它做好，單是這種精神，已令人欣賞。影片播放完畢，一眾導演、編劇、演員齊齊亮相，在觀眾面前接受提問，當中分享了他們拍攝這部電影的緣由與及心路歷程；在欠缺資源的種種限制下，他們也像劇中人物一樣，仍然一心一意地拍成這部電影，過程中一絲不苟，沒有因為是小成本小製作而降低要求。導演說，當初他是被一群單純地想把舞跳好的年青人所感動，這份單純、認真、一心一意的態度吸引了他，他便想把這個歷程用影像紀錄下來，想不到電影很讓觀眾受落，其中一位分享者更表達了目前香港正是多事之秋，希望這部電影能鼓勵香港人努力，堅持下去，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哽咽，想必是感慨非常。

看完這齣電影，令我重新回味香港人過去的奮發精神，我們父母一代豈非也是在重重困境中，資源匱乏下走過來嗎？他們在香港這片土地胼手胝足、一心一意地活下



去。我更加欣賞在片中有關競爭的描述，不錯，現實中難免競爭，香港更是個競爭十分厲害的城市，然而競爭不一定醜惡。劇中有兩隊hip hop競爭隊伍，其中一隊竟以識英雄重英雄的氣魄鼓勵對手，在對手低沉的時候，非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是激勵對手的上進心，說出成功的竅門，當對手成為競敵，變相是自己要再進一步，換句話說，良性的競爭帶來進步與及盡善盡美；香港雖是個充滿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是否也可以發展出這種有量度的競爭精神？

香港目前面對的政治、經濟、文化危機是前所未有的，筆者過去半年有機會在台灣生活，聽聞台灣在追求民主的領域上、經濟上，也曾經歷重大衝擊。無疑，在政治上，他們贏了一場美麗的仗，最終可以選舉自己的總統，然而在經濟上卻遭波折，為數不少的商戶、企業倒閉，原本有錢的人變成一無所有，曾經富裕的生活遂成泡影。表面上是個不幸的現實，但亦正是這些變幻，令很多台灣人反思生命的意義，有些人想通了，重歸田園，淡泊名利，有人告訴我，這是一股相當普遍的台灣風氣。其實中國人很早已看通危機的本質，就是有危必有機，當下就看香港能否在目前風雨飄搖的處境下，化危為機，重拾上一代認真生活、百折不撓的精神；亦仿效台灣人的反思能力，重建一套自己的生活藝術，繼續爭取真正民主的政制、追求公義的社會、與及培養一套有內涵的文化價值觀。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五期港幣二十五元 ×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五期港幣四十五元 ×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寄香港九龍旺角道11號10字樓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